



戰地行

著 姐 小 里 居

譯 光 葆 朱

版 出 社 版 出 外 中

戰地行

居里小祖著
朱葆光譯

中外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三

876.578

320

戰地行

目次

譯者序.....	一
作者小傳.....	一
非洲.....	一
近東.....	二
蘇聯.....	一五
從莫斯科到蘇聯前線.....	二四
亞洲.....	四四
返回美國.....	八一



3 0544 7052 5

55544

目次

—

戰地行

譯者序

居里艾芙小姐是法國科學家鐳發現者居里夫人的女兒。她是希特勒德國的禁書「居里夫人傳」的作者。「居里夫人傳」已使她成了世界馳名的作家。

她不避艱苦和危險作了一個十二萬五千里的世界旅行。她見了各國的士兵和領袖，跟他們談話。她還設法瞭解了戰略和戰鬥所憑恃的一般男女平民的赤誠。她在這部書裏描繪出爲自由安全與和平而全力奮鬥的世界，說明了人民的力量和人民的精神力量。

她在這部書裏使我們看見聯合國的人民在如何對法西斯主義戰鬥，使我們明瞭世界戰略的意義。

她的法國的國籍和她母親的名望爲她在世界各地打開了門戶，她能够看到了真象，聽到了真的聲音。這種特權和便利是別的記者得不到的。她用如此得來的材料寫成這部書，她以愛自由愛民主的狂熱，懷念淪亡的祖國的心情，和對法西斯主義的痛恨寫出了這部史詩。

她在原書的第一頁上寫着沉痛的幾行字：

「獻給我的母親——居里夫人

戰地行

她的誕生地在波蘭，
她的永息地在法國；
當我在我們的戰士羣中穿行的時候，
那兩個地方
仍被德國人佔着。」

這次封面裝幀是金風烈先生的設計，這是特別感謝的。

譯者——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於重慶。

作者小傳

本書作者居里小姐（名叫艾芙）倘若願意，她就能够憑恃她的美麗過一生優閒幸福的生活。

但是居里小姐之爲居里小姐，就在她不願意這樣做。她願意努力工作——盡力工作。甚至在她覺得要病的時候，甚至在她前一晚上整夜沒有睡覺的時候，甚至在她眼前的工作似乎超過她的力量的時候，她仍要工作。

倘若關於居里小姐能够舉行一個國際民意測驗，她大概是第一名「完美的客人」了。

印度確實熱烈地歡迎了她，中國，俄國和非洲也是如此。當然羅斯福總統和他的夫人，英國的國王和皇后，及西方世界大部分很著名的人在她以戰地記者資格週游世界之前很早就知道她了，而且招待過她。

居里小姐是一個最有人緣的人——她長着一副悅人的面孔，聰敏，熱心，多才多藝，謹而不虐。

她的工作合同需要她在英國受軍事訓練。她入了戰鬥法國女子志願隊。

最近八九年裏她除去作了許多報紙上的文章和講演之外，還寫了兩部著名的書——她母親的傳記「居里夫人傳」和她在盟國戰場的旅行記「戰地行」。

十年前居里小姐還被人們視為充滿學術氣氛的嚴肅的居里家庭中的浮華的女子。她的父母的震動世界的名望，遮暗了她和她的姐姐居里伊達。鑄發現者的兩個孩子能有什麼成就呢？

她的姐姐靜靜地步着母親的後塵研究科學去了。她的姐姐和姐夫茹里歐教授像老居里夫婦似地共同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金。

居里小姐可不同了。「我不厭惡科學，」她說。「但是科學使我害怕。」她穿起高跟鞋去跳舞。她向巴黎著名的裁縫店定做衣服。她常到吃魚子醬和香檳酒的地方，她和各種國籍的四海為家的人們交結。

居里小姐回顧那個時期的自己的時候說：「我愛愉快。巴黎是個令人愉快的奇異的城市……」她想音樂也許是她一生的專業了。她在兒時就彈鋼琴彈得不壞。十六歲時，跟她母親第一次到美國旅行之後不久，她開始長時間練習鋼琴。一九二五年，那時她廿一歲，她第一次在巴黎音樂會上演奏。立刻引起巴黎，法國各省和比利時許多人聘請她。她接受了幾個人的聘請。

她說：「批評家很客氣。我想與我母親的名字有關係。」

一切批評只能使她相信自己不過是小有天才而已。她說：「我自己認為我自己不是一個真正好的鋼琴家。我不能成為職業鋼琴家。也許我開始得太晚了。我的手指不能按照需要伸得那麼直。」

於是她用筆名為巴黎報紙寫音樂批評，她給巴黎的戲院改編幾個百老匯的劇本，其中的「趨」於一九三二年在巴黎上演最為成功。

這個時期她最關心的事情是侍奉她的衰老的母親。每星期有五個晚上她一個人同她母親在她們巴黎小小的住宅裏吃飯，不出去參加宴會。

後來她把全部時間獻給她的母親，幫助她寫科學論文，使世人不知道那時居里夫人幾乎要瞎了。最後她看見她母親快要離去人間了，她還瞞着她的母親呢。

一九三四年居里夫人逝世，其後不久，美國出版商多蘭公司勸她給她母親作傳。

「我告訴他們我要試作。寫起來我有種恐懼。我怎樣才能寫得確實，不至冤枉了她呢？」

她在巴黎和她母親的故國波蘭，差不多用了兩年的時間研究檢查有關居里夫人的文件信札。「那部分是容易的。我有個條理分明的頭腦。我可以成個好的秘書。但是寫傳就不見得是個好手了。倘若沒有把我寫的母親的傳記譯成英文的謝安（Vincent Stouan）先生，我真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才寫完呢。那時謝安先生跟他的太太在巴黎住，寫完一章之後他催促我寫下一章。」

「居里夫人傳」出版後譯成二十五種文字，成了許多國家的最暢銷的書。

居里小姐的講演生涯是由「居里夫人傳」一書造成的，她被邀到舊金山世界博覽會講演居里夫人，然後她正式開始旅行講演，她一向是先用法文把講演詞寫出，譯成英文記憶下來，因為她不願意照着稿子念，而且這也是她的合同所不許可的。

她成了美國最受歡迎的講演人之一，她說：「聽衆重視你，不算什麼，你重視聽衆才是要緊的。你不能憑空作聾人聽聞之談，倘若他們相信你誠實的，你不說謊來自欺欺人，甚至他們不同

意你的意見的時候，他們也熱心聽你。」

德國進攻法國之後，她的講演題材改變了。她當了法國情報委員會婦女科長，她不再講居里夫人，而講起法國婦女與戰爭了。她高傲地宣佈法國人民一定不顧一切痛苦犧牲堅決進行長期戰爭來保衛法國人民所信仰的生活方式。

德法停戰協定簽字那天，她從巴黎拍電給紐約前鋒論壇報痛斥停戰協定和它的創造者，她不久就離開法國到英國當自由法國的聯絡員，她向本國人民廣播，她廣播的不是綺麗的演辭，只是簡單的事實的報道，向法國人民證明他們沒有被擯棄，「自由法國人依然在戰鬥。」

一九四〇至四一年德國閃擊時期，她一直在倫敦工作。後來又回到美國講演，這次講演比較難了：「我再沒有母親或法國政府作我的後盾了，我完全以被侮辱的人民的悲哀的代表向一個尚未參戰的國家講話。」

美國人一向喜歡她，但是維琪不喜歡她，維琪傀儡政府取消了她的公民資格。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日，她乘飛機剪號出發作十二萬五千里世界戰地的旅行，沿途拍發新聞，搜集材料，準備她第二部重要的書。「天下一家」的作者威爾基說：「居里女士的『戰地行』一書是每個美國人應該讀的社會變化與政治運動的報告……」

居里小姐關於母親的不屈不撓的精神的記憶，在一切困難中支持着她，她在俄國受凍，在利比亞受熱，在仰光睡在硬木板上，但是她一點不發怨聲，她想起她母親在沒有暖氣的樓頂和實驗室裏

研究多少年只要有套衣服可換就覺得滿意的時候，她怎能發怨聲呢。

德國空軍閃擊倫敦時期，居里小姐聽見炸彈落下的時候，仍安然躺在床上。「我想還是照常睡的好，上次大戰期中炸彈落在巴黎時，母親讓我們呆在床上。倘若我們要求起來，她要驚慌了。」

居里小姐的胆量很大，她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夜間一個人那兒都敢去。「我母親不要我們太小心。上次大戰時她讓我們爲農人工作。幫助農人收割莊稼。那時我才十三歲。」

居里小姐在埃及會患瘧疾，現在有時也患瘧疾。但是不久就好了。她想：「我母親患肺結核病時不是在沒有地板的實驗室的一個潮濕的房間裏工作，後來反而莫名其妙地好了麼？」

居里小姐在這次大戰中做婦女志願隊員的工作，恐怕比她母親在下次大戰中的工作更爲艱苦。居里夫人組織了流動愛克斯光隊，她親自率領一隊到前線附近的救護站工作。

居里小姐沒有宗教信仰。她母親不是用宗教把她養大的。居里小姐說：「但是她瞭解宗教，她不反對宗教。我也不反對宗教。那是每個人自己決定的事情。」

居里小姐的母親非常節儉。居里小姐也非常節儉。她確實是個好的事業家。多蘭公司的約翰孫和她的講演經理人里科爾斯頓都說她在訂合同時候非常仔細。里科爾斯頓說，跟她簽訂戰爭結束之後幾次講演的合同時候，她問：「倘若通貨膨脹了怎麼辦呢？如何保障我不受通貨膨脹的損失呢？」

但是你要記住居里夫人並非吝嗇鬼。她會把她自己和女兒可以繼承的龐大的財產送給全人類了。那是她發現了鐳之後，她拒絕了專利權。她說這個發現是全人類合法的財產。

居里小姐爲了自己的理想和朋友，也像她母親一樣毫無吝色悄悄地把錢拿出來。

「我不如我母親好。」他說。「我比我母親愛花錢。但是我不要金銀寶石的裝飾品或負擔不起的東西。我喜歡工作。我喜歡這個樣的生活。我認爲我不工作掙錢就不能安心活下去。」

居里小姐從未結婚。據她的朋友說，她並非沒有結婚的機會。也許因爲她記住她母親的話：「我認爲把一個人的生活興趣完全放在狂濤似的戀愛上邊是灰心失意的根源。……」

居里小姐說：「因爲我跟我母親住慣了，所以除了她以外我跟誰都不易住慣。」

法國的淪陷使她把最後一點浮華的氣味都消滅了。她從紐約華麗的房子裏出來，搬進兩間傢具簡單的質樸的屋子裏。她不再到咖啡館去了。

居里小姐爲法國悲傷，爲波蘭悲傷，爲一切受了戰爭痛苦的人民悲傷。同時她用刻苦的精神——居里夫人的精神——得到了成功。

前些日子有些人又問她：當這麼一個母親的女兒不是很難的麼？她興奮地回答：「簡直沒有法子當這麼一個母親的女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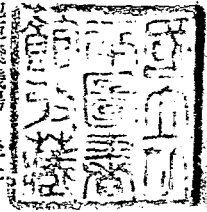
實際上並非如此。

居里小姐說：「十年來每逢我把自己和母親比較時候，我便覺得羞恥，覺得侷促不安。在成就和優良方面我不如她。她是偉大的。我不偉大。人人知道這個，而且這是千真萬確的。但是倘若我能做點對於世界有用的工作，我就心滿意足了。」

非洲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日的早晨五點三十分鐘，我在汎美航空公司的紐約拉瓜地亞飛機場，坐上橫越大西洋的「飛剪」號。

我爲這次旅行籌備了很久——現在我可要動身了。我要離別紐約了，離別和平的美國，作數月的漫遊。從那個禮拜一清晨起，我就要出發，盡一切飛機，輪船，汽車，火車的速度，奔向世界的戰場，向各大陸上那些正在對納粹鬥爭的國家而去。我不知道我能走多遠，我只知道一個單身的旅行者對於戰爭整個的畫面，祇能獲得一瞥而已。可是，我很知道我爲什麼旅行。我要看看自由人民的同盟如何工作，這個同盟正爲了進行一個全世界的偉大的「獨立戰爭」而緩緩組成着。我想看看這些反納粹國家慢慢地縮小包圍圈，終有一天能擊斃敵人。真正把盟國間的戰鬥人民團結起來的，是什麼東西呢？他們有什麼分歧的和相反的意見？什麼是那些正在受苦並且在我們一邊作戰的人們——從許多地方來的白種人，黃種人，櫻色人，黑人——所要求的？這個從熱帶的非洲擴展到俄國和遠東，經過熱帶和寒帶，經過雪地和沙漠的廣闊無邊的自由的營壘，究竟是什麼樣子呢？這就是我所要知道的。



海水在我們下邊呼嘯着，我們動身了。紐約，美國，都隱沒在寒冷的濃霧裏了。

我用了兩個鐘頭的時間在開羅城裏洗了我的頭髮修了指甲，經過一番思量以後，我覺得開羅使我最喜歡的要算修剪指甲的人和女店員都說法語這件事了。隨後我就開始準備到利比亞前線的事。這絕不是容易的：從來沒有女子，不論外國的或英國的，會得到允許到非洲西部沙漠裏。我到達開羅正是很緊張的時候，正在大規模進攻開始的時候，同我談話的軍人都似乎認爲把我送到前線去不是應該採取的最迫切的戰鬥措置。

我一面等待他們改變他們的意思，一面同空軍中將泰得爾，美國公使克爾克，蒙克頓先生，及國務大臣李台爾頓進行「打破先例」的談話。我在李台爾頓先生郊外的家裏同他喫飯。在這以前的十二個鐘頭裏確有幾項旅行上的障礙被克服了。下午七點鐘有人打電話告我說蘭多爾夫邱吉爾少校（邱吉爾首相的兒子）明天黎明時動身到前方，他要帶我一進去。喫飯的時候李台爾頓對我說：「那麼要記住：我沒有聽說你明天要到沙漠去。關於這事我一點兒也不知道，我沒有許可你去，也沒有鼓勵你去。」我對於這種不贊成的和露的表白非常感謝。

十一月二十三星期日侵晨，在開羅飛機場等待軍用運輸機（一架美國羅克希德廠製的羅得斯塔式機）出發的英國陸軍軍官和英國皇家空軍駕駛員看見邱吉爾少校（那時他是中東陸軍宣傳局局

長)從他的汽車裏出來，帶着一個不知姓名的女子——後來他們知道這個女子也是想乘飛機的，他們顯出不可言喻的驚訝。有個年長的陸軍上校也莫名其妙。但是帶着典型的英國人的拘謹的軍官們沒有問我是誰，或者問我爲什麼到了那裏。等到他們已經發覺他們最大的焦慮是對的時候，我已走進飛機坐下來了，飛機一起飛，他們要做什麼也來不及了。他們只得保持着一种尊嚴的沉默，顯然在奇怪究竟是那個小伙子允許她坐這架飛機去的呢。這一切都使蘭多爾夫邱吉爾高興，他還有些「跟軍官們鬧惡作劇」的學童的頑皮。

下午三點鐘光景，我們的飛機很早就幾乎正是利比亞的邊境上降落了。跑道同周圍凹凸不平的暗淡的沙漠沒有大的差異。我們離現在進行攻擊的第八軍前進戰鬥司令部有幾百碼，離火線約有二十英里。除了直到地平線上無邊無際的沙漠之外，什麼東西也沒有。在沙漠上零零落落有些載重小車和很小很低的孤離的天幕，都是沙土顏色。我爲了看戰爭，離開紐約整整兩個星期了。這是作戰的地方——在荒涼嚴峻的陸地上。

我到了馬達連納堡(那時戰鬥司令部在那兒)交際處的天幕時，一個瘦瘦的好看的軍官走過來歡迎我。他說：「你還記得嗎？在巴黎，在威拉，M——的家裏我們一塊兒喫飯，她給我們大堆魚

子醬。」於是我認出來那是菲里亞斯特烈——現在是亞斯特烈上校——電影女伶馬德林卡洛爾的從前的丈夫。在沙漠裏同樣的事情發生過好幾次：我遇見了個風塵僕僕，曬得黝黑的英國人，滿身是汗和沙土，幾乎使我認不出來了，我聽到一種優雅的帶着一點矯飾的聲音對我說：「在這兒看着你是多麼令人快樂呀，自從那次在里茨飯店吃午飯以後我們再也沒有會過面呀。」——或者「自從在戴西的跳舞會看見你以來再也沒見你呀。」可是——我覺得里茨，偶然的魚子醬，和曾在英倫海峽兩岸在和平時期消磨過我們時間的各種各樣有趣的事物，很合邏輯地都把我们引到這兒了——引到德國有系統地建造多年的鋼鐵怪物正試圖殘殺我們的這個荒涼的地方。

司令部離皇家空軍戰鬥機隊的基地只幾百碼。我的第一天下午消磨在冷風裏看我頭上飛行的機羣上了。

站在風日中觀看皇家空軍，飛行員執行他們的戰鬥任務，給了我不能磨滅的興奮的印象。我看那些飛機直到我的脖子痛了，我的眼睛疼了。關於航空技術我什麼也不懂，我僅能得到不是任何專門知識給加多起來的簡單直覺的印象。那時候我自己說：「這個天空裏有這麼多的飛機——全是同盟國的飛機，全是我們的飛機。這不像我們失敗時候空虛的法國天空了。這不像英國獲勝的英倫之戰時候的英國天空了。」

天色已經晚了，我們在亞斯特烈上校的天幕裏喫飯，這是唯一有燈光的天幕。我們吃了很好的

牛肉，一罐頭蔬菜，和一個有果醬的小布丁。因為特別優待我，所以讓我在軍用汽車的後面座位上睡覺。我向米却爾借來一個吹脹了的橡皮汽墊來墊着，最後蘭多爾夫邱吉爾很英雄氣概地把他在那耶路撒冷市場買的一件白羊皮外套借給我，我再三推却也不成。這個意思就是說應該使我很暖和很舒適。我周圍的英國士兵爬進沙土上開鑿的狹小的壕溝裏躲避夜間的寒冷。在我的車子的右邊大概有十個士兵宿在一輛卡車裏。左邊有兩個小小的特別的天幕，非常的短而且小，我居然能看見睡在裏面的軍官的腳伸在天幕外邊了。真也奇怪，白天我沒有遇見這些軍官，也從未得到機會知道知道那些腳是誰的。

在這個沙漠裏我們只有兩個選擇：逗留在司令部，什麼也看不着，或者倘若不到前線去——因為沒有前線，試着更接近戰鬥。一位名叫荷頓的皇家新聞專員向我建議說我們可以坐上一輛汽車，往北去看看那邊有什麼事情發生。

我們很快就越過了利比亞邊界和人人稱爲鐵絲網或「墨索里尼鐵絲網」的邊界，那是一道鐵鏟製很密的鐵絲網，大約有十英尺寬，三英尺高，二百英里長，墨索里尼沿着利比亞邊界展開這麼長的鐵絲網，據說是爲了防止土人部落逃回意大利的領土和法西斯統治的恩惠。這道鐵絲網的連續已在好幾處被切斷，那兒有了寬大的缺口，由英國兵豎起了電桿，這道鐵絲網對於飛機，坦克，載重汽車或者在陸上或空中迷路的軍隊，確實是個恩惠。人們根據這道鐵絲網，往南或往北總能找到方

向。

當我們在利比亞領土裏前進的時候，沙子漸漸黏到我的臉上，漸漸使我的喉嚨發乾了。大概一小時之後，我們停住了：在鐵絲網那邊有兩輛大載重汽車，載着德義的俘虜。押送兵也停住休息。我們慢慢往前走，等到我們發現鐵絲網的缺口，我們轉了一個灣便向俘虜走去，我們到了的時候，他們正從汽車裏下來伸舒他們的腿。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遇見穿制服的敵人，第一次能同他們談話。

我同一個高身量的漂亮的德國飛機駕駛員談話，他二十四歲，他參加過德國對我祖國的征服，還能說少少的法語。

我們談到他的家鄉，談到他從英國和美國得到的食物。當我提到美國對英蘇的援助正在增加的時候，他似乎感覺興趣，但不願提出任何問題。當我要走時向他說了再見之後，他突然轉身向着我，嚴肅地說，儼如傾吐他心裏時時刻刻積壓着的東西似的：

「我可以知道貝當元帥對於一個法國女子同英國兵到了這兒作何感想麼？我想他恐怕不太高興罷。」

我溫和地解釋說很多的法國人——我是其中的一個——不承認康邊德法停戰協定，而且認為他們仍對德國作戰，直至勝利為止。

如果在一九四〇年六月之後戰爭停止了，這個二十四歲，帶着一付沒有表情的面孔的青年，現在已經住在德國，也許住在巴黎了，他看着納粹化的歐洲，看着大日爾曼迷夢的實現，一定高興極了。但是英國繼續戰鬥——所以今天德國飛機駕駛員成了英國的俘虜。

過了好多個月，在我回到紐約之後，我又想起這個非常相信希特勒勝利的德國飛機駕駛員。一天晚上晚報登載着英國皇家空軍對德國的一次猛襲。那時我由不得想起在沙漠中同俘虜的談話是一個簡單的字：一個城市的名字。我會問過他的家在什麼地方。承他用乾枯敵意的聲調惠賜回答：他的家在科隆。

走了十五英里之後，我們接近了戰場。我們沒有在戰場裏——確乎沒有——但是我們離戰場不遠了。我們遇見的在零零落落的載重汽車或裝甲車裏的英國士兵都是些好多天沒有刮臉，換衣，或洗澡的人，都是些自從攻擊開始以來幾乎沒有睡覺的人。他們長着亂蓬蓬的頭髮，穿着破爛的制服。他們的臉，他們的鞋蓋了一層沙土，他們的眼睛被鴉片煙紅了。他們同他們個個敵人比起來是如何的不同呀！他們一點兒不誇誇——其實，現在也沒有什麼可誇的——但在他們的疲憊的臉上我可以看出他們縱然打二十年都有牢不可破的決心可憐的。

我們協助兩個長鬚鬚的人，他們的載重汽車陷在沙漠裏了，汽車輪胎被榴霰彈炸破了！這輛車

是激戰中的傷亡者之一，這個激戰仍在離我們只有幾英里的地方進行着，雙方都受有嚴重的損失。這兩個人一個是藍開夏人，另一個是愛爾蘭自由邦人。

這些人自從一九三九年以來每次戰爭都參加了。他們曾在法國作戰——從法國撤退。他們曾在希臘作戰，又從希臘撤退。後來遭遇了克里特島慘敗，沒有一架戰鬥機抵抗德軍的俯衝轟炸機來掩護他們。現在他們在利比亞——終於採取攻勢了。

那個愛爾蘭人對我說：「我們每次和德國兵戰鬥，我總對自己說：這就是看着我在敦克爾克再上船的德國兵；這就是迫我從克里特撤退的德國兵。他們一再打擊了我。現在够了，够了，我要看着他們從什麼地方再上船了」。

現在我們離開了墨索里尼鐵絲網，在廣漠的荒野裏徘徊。本來給我作嚮導的軍官荷頓想領我到前進空軍基地，但是沒有找着。我們的汽車搖盪我們，使我們互相碰撞，假如我們在非常擁擠的人羣裏——但是我們不能更寂寞下去了。我們沒有吃飯，我們已把我們的罐頭鮭魚給人了。我們嚼着少許的軍用餅干——我拿出一個長頸威士忌酒瓶來。

一般情況似乎不很令人興奮。我們所遇見的每一羣人都說着同樣的事情。總合起來是：「有一次坦克戰，德軍突破了我們的障地，我們失敗了。」其後盡是人們問我們，他們怎樣能夠回到他們

的本隊。真的，我們不知道：我們甚而不知道自己的道路呢。

我們向着回來的人羣往前移動。疏落的一羣一羣的載重汽車顯然正在急忙撤退裝備和人員。我們向一個軍官問路，這個軍官心中懷着奇異的想法，從他的軍用汽車裏跳出把他的手槍瞄準我們。他說在交談之前，我們必須互相看過身份證——我們這樣作了。這個具有唐突特質的短短的一幕，使我們好笑，但是這個軍官所採取的防範手段根本是合理的。在沙漠裏決不能以為英國汽車載的就是英國兵，或德國汽車載的就是德國兵——因為爾獲載重汽車，坦克車，汽車，後來又失了，失了之後又得回來了，來回來去地過手。

爲了回到鐵絲網去，我們向右方折行；這樣我們便一定不會迷路了。我們再撞進南非洲軍隊的一個集中地，遇着都往南開的救護汽車和皇家空軍的汽車。於是我們發覺我們找的那個空軍基地已經撤退了。這確動搖了荷頓向前移動的願望。當我們看着遠處多股濃烟的時候（大概汽油供給站剛才被炸了），他命令司機掉回車頭開回馬達連納去，他也不注意我說些什麼。這是他第一次發現自己已在沙漠裏對於一個女人要負起責任來，他再不希望在一「像這一天的日子」來試驗自己的命運了。

我們一到營幕就大吃一驚；原來我們不在的時候一切東西都裝載好了。一個正式的警告來了！——就是我們必須準備在得到通知後半小時內離開。原因是一個德義坦克縱隊已開始向我方推進。德義坦克越過鐵絲網的時候，已被認出來了，現在正迅速地向我方駛來。當然，這些坦克還離我們很

還。此刻我們只好等待命令，沒有別的辦法。

一個皇家空軍大隊長剛剛見過坎欽勒克將軍之後，我們遇見了他。他總結形勢如此：總司令表示十分自信，而且他一點兒也不知道他的軍隊在什麼地方。我記下這句話，作為西部沙漠戰爭最具體的描寫，那兒沒有前線，那兒每個人都要輪流迷路，那兒有限的收穫或有限的撤退都是不關重要的，那兒關係重大的是一再打擊敵人的決心和確實能夠用以打擊敵人的物資與人員的數量。

冷得令人寒顫的夜過去之後，天氣忽然很暖和了。我同蘭多爾夫邱吉爾和前鋒論壇報的希爾乘汽車到最近的皇家空軍站——第一一二中隊去。

在這個「混戰」的日子，我說不上來為什麼我覺得十分安全，充滿了信心，我同幾個皇家空軍的青年坐在暖和的太陽下邊，笑他們的拙笨的談話，同他們瞎聊。我想我簡直又在證明這個絕對的定律：戰時最好的人，總是在前線上的，原因若不是他們要求派到那兒便是沒有要求不把他們派到那兒。我乘飛機離開懶散的沮喪的開羅城四個鐘頭之後，我又發現了在英國和英國領屬裏產生的這一代最勇敢的人。

同我在西部沙漠裏吃午飯的皇家空軍駕駛員半點鐘之前還在用他們的生命作賭博，半點鐘之後他們又要回到他們高入雲霄的賭博場裏。然而，危險確乎是他們最不受談的東西。他們的勇敢是他們自己的武器，他們的神密。假若他們墜落陣亡，他們仍是無人知道的，只在普通公報上宣佈：「

「第若干號飛機」其次出襲……未返。」要說的是飛機，人就不提了。就皇家空軍來說，這已不是像一九一四年幾十個特出的飛行家，幾十個偶像化的「飛行家」的戰爭了。

我所希望的這些很青年的孩子們——比我年青得多——對我唯一友好的歡迎是他們不要發覺我在他們面前自己覺得多麼卑微。

近 東

我們扶搖直上進入了棉絮似的白雲裏，高至一萬五千英尺。我們從雲縫中間不時瞥見伊朗的山嶺。

忽然，好像一隻魔手給攤平了一塊平坦的原野出現了，上邊有灌溉的水田和稀疏落落的鄉村。

厄爾布爾茲山脈白色的峯巒掩護平原的一邊。德黑蘭在望了。

我自從離開開羅已整有一個星期了。我能够坐着盟軍飛機從埃及經過敘利亞，巴力斯坦，和伊拉克飛到伊朗這件事情，就證明了世界那個部份的反納粹戰綫的強固了。

德黑蘭現在已是旅行指南上所稱的一個「現代首都」了，這個意思是說一切優美的風景都被嚴格地取消了，惹人注目的新建建築物建立起來了——這是遭受了一九二〇年代的「時髦人物」觀念的痛苦的首都。但是，老伊朗國王並未努力設備適當的陰溝系統，所以飲水仍在馬路與人行道之間的小溝裏流。真的，老伊朗國王萊薩（一八七七年——一九二五年）在積極努力復與他的國家的時候，強迫他的臣民穿西裝，禁止婦女帶面紗。這固然不能厚非，但結果是糟糕的。伊朗解除了許多骯髒和污穢，同時也失掉了從前東方的巍嚴的和迷人的魔力。

我到了德黑蘭的時候就住在唯一找到一個房間的地方——達爾班飯店。這個飯店在市外幾英里的腳下，沒有公共汽車，沒有營業汽車，有一架壞了的電話。早晨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從享有汽車特權的一個英國軍官或一個波蘭軍官那兒得着便利到德黑蘭去。

從英國公使館到蘇聯大使館是非常便利的，這兩個使館緊挨着。兩個使館佔的地面都很大，周圍是惹人注目的高牆。我沿着花園裏狹窄的泥路不停地走，從一個辦公室到另一個辦公室，目的是籌備我乘飛機到蘇聯的事情。英國人對於毫無準頭的俄國飛機完全採取懷疑的態度。因為俄國飛機打算每星期在古比雪夫，巴庫，與德黑蘭之間飛行一次——但事實上已幾個星期不見飛行了。

俄國人就比較使人興奮了。我碰見了一個很和藹可親的參事伊凡諾夫先生，說得很好的法國話，而且對於我要訪問戰時蘇聯一事，似乎十分高興。顯然他已經接到了關於我的指令。他迅速地檢查了我在華盛頓得到的俄國的簽證之後，他說我可以搭坐第一班到古比雪夫去的飛機。他給我的印象是所說的這班飛機在「兩三天之內」可以走。在德黑蘭我向誰得意地宣佈這件事情的時候，誰都答以苦笑。

三天，結果變成了三個星期。這期間我仍然想着「依照原定計劃在某月某日回到美國講演」，我幾乎要急瘋了——俄國人對這種事情似乎一點兒也不着急。每隔兩天左右我就去找伊凡諾夫先生探問起程的希望如何。他露出含糊的微笑並且作一個手勢，大概示意說：「飛機要從巴庫來——也

許不來。我想它是要來的。」然後他照例敬我一杯茶。

在大風吹蕩的飛機場裏，俄國駕駛員——兩個漂亮健壯的男子，穿着破皮外氈，毛邊帽子，高統靴——在塗着紅星的蘇聯造的道格拉斯機上正忙着工作。馬達已經發熱了。我付過我的飛機票錢——從德黑蘭到古比雪夫八十美元——加上過重行李費二十元，總共一百美元；我上了飛機坐在前面座位上。馬達震吼了，門關上了，兩個愉快愛說話的蘇聯駕駛員很快入了座艙——忽然我們起飛了。我快樂，我異常興奮。我向着對於我完全新奇的氣候，國家，景物，政體飛着——向着一個不知道的國土飛着。

蘇聯

古比雪夫——古代的薩瑪拉——是被一個巨大的城市侵佔了的小鎮。在蘇軍大撤退的時候，龐大的蘇聯政治機構，外交團人員，外國記者，其後是優秀的蘇聯伶人，歌聲家，和音樂家湧入了古比雪夫。只用幾個鐘頭的時間就可以發現這個臨時首都完全是人爲的。除去外國人和關照外國人的俄國人之外，在古比雪夫沒有一個要人，史達林和所有實際指揮作戰的領袖們仍在莫斯科，我想在這種攻擊與反攻的煩亂的時候，他們亟欲解脫「不必要的人們」，免得累贅。

在古比雪夫，像後來在莫斯科一樣縈繞在我腦中的印象是：（一）人民的生活很苦。（二）倘若他們的生活苦，他們也絕對不在意。（三）人人工作。我從未遇着一個健康而同時又閒着不工作的人。（四）一切男女所關心的是戰爭：爭取戰爭勝利幫助作戰的紅軍士兵，人民甘願爲史達林的號召而從事一切犧牲。

在古比雪夫我參觀的工廠，一點兒都不算是個「模範的」工廠。關於這個工廠唯一可驚異的事就是這個工廠居然是在那個地方和莫斯科卡克諾奇大工廠的一部份現在古比雪夫一個稍舊的建築物裏生產成千的球承，這個建築物在幾星期以前不過是個收藏和修理破舊過時的機器的棚子。

什麼都不是很整齊的——工人和工具都不是很整齊的，但是到處都是工具的響聲。建築物的每層樓都是古怪的小樓梯，粗糙不平的地板，男的和女的——女多於男——在油膩的機器旁邊忙碌着。婦人和女孩子們頭上包着毛織的手巾，照俄國人的方式拴在下巴的下面，腳上穿着名叫瓦連基的長統靴，那種靴筒直沒有一點樣子，厚，重，硬，好像紙板一樣，但是把腳保護得非常好，不怕泥，雪，冷，雨。許多女工穿着他們的大衣，天氣十分冷。他們站在機器工具前面，臉色嚴肅，兩眉蹙着。這些俄國婦女只作她們工作上必要的動作。她們令人發生她們完全集中在她們工作上的印象。

這些機器工具來自世界各地——從美國來的最多。一個自動的半徑研磨機上有「馬薩諸塞州斯普林費」標籤。幾個磁石絕緣器來自通用電氣公司。再者，有些義大利托里諾城義大利汽車工廠的機器工具也進了這個工廠。

在一個部門裏領我參觀的一個很年青的工人注意到我在檢視每件工具是那裏製造的。當我走近一個較大的機器的時候，他讓我站住並且讓我知道這架機器是蘇聯造的，他輕輕拍着這鋼製的工具好像它是他的個人的朋友，或是他自己心愛的孩子一樣。他帶着春風滿面的微笑重複地說「蘇聯造……蘇聯造」直到他使我確實認識這果真是一架蘇聯機器——在他的國家之內，由像他一樣的人民製造的機器的時候，他才走開。他的臉上閃耀着得意的光采。

一月十一，星期日。我聽說正教堂在十一點開始作禮拜，我請了一位通譯名叫伊斯萊洛維齊太太——同我到教堂去。我們下了汽車，踏上一條蓋着硬雪的小路走向約有一百年的頗爲可愛的大建築物去，這座大建築物是當古比雪夫還叫薩瑪拉的時候，由一個富商慷慨捐造的。

我必須先從門口排成可憐的一行的幾個乞丐面前走過。他們突然使我想起在古比雪夫或巴庫，在有購買定量食品行列的城市裏，我從未在街上遇見一個乞丐：圍繞着薩瑪拉教堂這三四個乞丐，事實上是我在蘇聯整個期間僅見的。他們是老年人，長着長鬍子和長頭髮，衣服非常破爛，病態深沉。

同我一齊進教堂的人很稀少，我以爲這教堂恐怕是半空的。然而相反，這教堂十分擁擠：我來得稍晚，大廈裏已有了祈禱聲和唱歌聲。我雖然不懂正教儀式，但是這種儀式中的悲傷的禱訴和無限的悽愴立刻淹沒了我。

我把光耀奪目的銀白的雪景留在外面。在裏面，圓頂房子裏神祕的幻影，聖像前面閃耀的特殊微弱的燭光，柱子上和牆上緊緊排列的無數聖像的金框上的光彩，和由窗戶透進來的溫和的陽光都混合一起造成一種非常親密的氣氛。的確，站在那兒的人們似乎是同上帝親密的——或者至少是同他們自己的痛苦，同他們自己的祈禱是親密的。在崇拜上帝和可敬的社會習慣聯繫一起的地方

什麼世俗風氣都不能侵入各派的教堂寺院的禮拜裏。在蘇聯，許可作禮拜，是的——然而官方不予提倡；所以作禮拜顯然不是在星期日早晨「要做的事。」我能姑且這樣說，聚集在薩瑪拉教堂裏的男女是被不動搖的信仰給領到那裏去的。

我注視我周圍的面孔——然後注視其他的站在教堂裏互相緊挨着的成百的人們的面孔。這些面孔沒有一個年青的，好像年青的一代已經消逝，已經脫逃了——好像僅有年老的人還在爲了那些迷途的，爲了那些不在的人祈禱。

我走出來的時候，我心裏說：「我剛才在這個小小的薩瑪拉教堂裏所看見的和所感覺到的不是在蘇聯其他地方所沒有的麼？」不久我便明白了。我有一刹那的工夫彷彿走出了這個建立在固定不變的法則之上的有組織的蘇聯社會。在教堂裏禱告的老頭兒和老太婆的臉上，在神像的塗色的面孔上，在神告節優雅生動的景色上，或聖者生涯的插話裏，我發現了寬赦和悲天憫人的溫情。

蘇聯的宗教自由問題曾在英美大加討論，而且成了英美對外政策的相當重大的問題。這兒我要作的事情當然是發一封電報到紐約和倫敦報導教堂裏如何擠滿了禮拜的人和我參加禮拜的事。我知道我要發出的每個字可能同時是真的又是假的，同時是實的又是虛的。我參加了一個動人的禮拜是真的——我看到了一個人滿的教堂也是真的。但是我不能完全確定結論應該是基督教信仰在蘇聯依然生氣勃勃而且被尊重。我記得這個教堂裏的人們——衰老，貧窮，愚昧，迷信，微賤，即將逝滅

的人們確實顯著地向我肯定了這個。蘇聯年青的一代都和基督教分離了，他們皈依了不給別種崇拜留有餘地的一種新的信仰。

那個星期日我還訪問了一個著名的人物——她恰是我在蘇聯遇見的唯一衣着時髦的女子。這個二十五歲的列斐辛斯卡雅若不是蘇聯第一個最好的，確實是第二個最好的舞蹈家，具有無匹的優美和第一流技術的典型的舞蹈家。她榮獲一九四一年十萬盧布的史達林獎金，這是一個藝術家能夠得到的最高的獎賞。

但是我見到她並非在歌劇院的化粧室，她也沒有穿着含有詩意的「天鵝湖」的戲裝。我是在蘇聯情報部一間辦公室裏見到了這個瘦小的女子，她長着淡棕色的頭髮和一副孩子氣的臉。她坐在一張辦公桌的後邊，很忙碌地在記錄簿上揮動她的鉛筆。她外面穿着紅白格花紋的工作服，裏邊穿着一套海軍服。她除去在歌劇院跳舞得到很大的成功之外，還在共產主義青年團裏擔任社會工作已經幾年了。她是反法西斯青年委員會書記。

我剛看見列斐辛斯卡雅，我簡直沒有完全清楚我眼前的女子是不是我來求見的舞蹈家或反法西斯人物。列斐辛斯卡雅用窈窕的小姑娘的聲調回答我的問題，我們的談話來回來去不出舞蹈，政治，和戰時工作之間。我對於她同時居然能作這麼多不同的活動說了一點表示驚異的話。同時作幾種活動，她似乎不以爲奇。她說她除去是個舞蹈者和社會工作者之外，還是個妻，也是個母親呢。

我母親的名字——居里瑪麗——對於她，像對於我在蘇聯遇到的一切受過教育的女子一樣，好像一個有魔力的口令那麼靈。我是一個科學家的女兒，是個曾經給全世界的婦女樹立楷模給了她們希望的一個婦人的女兒，這件事實——還有我和繼續對德國作戰的自由法國人民聯合一起這件事實對於蘇聯人民似乎比我的記者證明書意味着更多的東西。列斐辛斯卡雅突然向我歪着身子說：

「今天晚上你作什麼呢？」

我說我要在一個飯店裏同一個美國記者吃飯。

「啊，真的，你後來還可以吃的呀。」她很興奮地說。

「今天夜裏是新年紀念的最後一夜了，古比雪夫的兒童的新年紀念已經繼續舉行一個多星期了。我要爲孩子們舞蹈去。你不來麼？」

我同前一天認識的米耶斯東到新年游藝會去。她是紅軍裏的一個中尉，在蘇聯情報部工作——一個矮胖的紅光滿面的三十五歲的女子，紅軍軍官的女兒，又是紅軍軍官的妻子，她自己還是個紅軍軍官。

表演的節目很多，認真說並不算好。但是兒童都迷了，我也如此。這種表演彷彿各時代的俄國都集到舞台上：中世紀的俄國，僅僅二十五歲的新俄國；史達林的俄國，和童話裏的俄國。

一陣狂熱的歡呼警告我有某種重要事情發生了：列斐辛斯卡雅正在進來。這些成百的兒童顯然

是很熟識她。她穿着一件輕柔的短白外衣，頭髮上戴着一朵紅花。看去，她就好像一個快樂的兒童。這個舞台的條件對於一個偉大的歌劇舞蹈家的表演是不太好的。地板粗糙，燈光都不正確，一個拙笨的鋼琴師的伴奏也壞到極點。列斐辛斯卡雅似乎滿不在意。她的腿腳以奇妙的變化適應音樂的節拍。她泰然自若地跳着最難的步子，臉上浮着愉快的微笑。彷彿她越跳越高，越旋轉越快。她是老練的音樂家，她自己也就是青年。

喝采的聲音時斷時續。現在我必須到後台去，到這個明星的化粧室去對這個穿短白外衣的年青人物說：

「反法西斯青年委員會書記夫人，我熱忱地祝賀你。」

米耶斯東中尉和我開始擬定計劃：我們知道從今天這個星期日以後，我們要在一起消磨一些時間。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羅索夫斯基決定我不必照別的記者的常規辦理，我在俄國的旅行可以有個單獨的計劃。在我逗留俄國的期間，米耶斯東中尉始終伴隨我。第二天早晨我們一齊動身乘飛機到莫斯科。

寒冷的陽光在莫斯科飛機場上歡迎我們，在那兒我看見了幾架軍用飛機——運輸機，轟炸機。

和戰鬥機——都是俄國造的。

我們坐車穿行莫斯科城市。馬路異常地寬，行人道很窄。若是人行道寬馬路窄，那就比較好了。步行的人比坐車的人多得多，陰暗的忙碌的人羣沿着半空的街道走着，僅有稀少的汽車和電車。

在一個實際算是完整的首都裏，我看見人們忙碌地走着，電車在跑着。過了一會我才知道街上的車輛大約只有平時的一半，莫斯科的人口已從四百萬減到二百二十萬。在幾個大的住宅裏整層的房子都空着。有些居民已經疏散了，其餘的人遵照當局的勸告集到建築物的下層，爲的是省煤。

其後我看到商店，商店外面罩着百葉窗，似乎都關閉了，這樣弄得街道呈現死了的樣子，好像這天是一個休假日或者是一個喪日。窗戶上罩住木板原因是燈火管制和防止榴霰彈的破壞。商店大多是開着的，但是從道旁看似乎不是這樣。

然而賣食品的商店是容易認出的。不是行人道上站着長列的人等待着進去，就是在較大的商店裏有長列的人擁擠在走廊裏或櫃檯中間。

購買食品的人大多是婦女。我計算她們每天一定得在嚴寒的大街上等待一兩個鐘頭，有時還需更多的時間來購得她們的定量食品。這是她們困苦與疲憊的一種巨大的負擔。然而她們沒有一個人顯出不能忍耐的面色。這種等待似乎是她們戰時生活甘心接受的犧牲的一部份。

關於分配給平民的貨物的嚴格限制，我得到一個概念——這是在我表示希望弄到一雙瓦連基的時候。瓦連基是在俄國冬天人人必穿的靴。我不知道瓦連基是否容易弄到，我說我打算「買一雙，或者借一雙，等我離開俄國時奉還。」米耶斯東的難為情的答覆使我覺到這正是我不該要求的東西。她輕輕地說她不敢確定這件事情能否「辦到」。我立刻擱開了這個話題，我覺得自己弄了一個大錯。外交人民委員會有權力把我用飛機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飯店給我屋子住，許可我到前線去。但是到了弄一雙瓦連基的時候，它的權力已經完了：在首都除非我們從別人的腳上脫下來，否則弄不到一雙的。

在波爾卡雅卡魯格斯卡雅街的水冷的人行道上有很長很長的待購食品的行列。距離這羣列隊等候的婦女只有幾碼遠的地方，碰巧有幾輛載重汽車滿載鮮紅好看的凍硬的肉駛往前線去了。

一個緊緊包在一條厚圍巾裏的老太太走到我們跟前說：

「這是真正的俄國冬季，凍俄國的敵人的冬季。凍希特勒的冬季。」

從莫斯科到蘇聯前線

我到我們各戰場，四萬英里的旅行中現時依然最清晰的留在我記憶中的是：在蘇聯，我看見了從納粹魔掌中解放出來的城市，鄉鎮，村落，道路，森林，田野，河流，男女，兒童，馬，狗，牛。我看見了希特勒的兵在屬於歐洲大陸的一部份土地上退却。「看德國人退却！」這幾個簡單的字對於一個法國女子含有何等的意味呀。我坐着汽車在俄國結冰的大陸上走着的時候，我看見伊斯特拉，沃洛科拉姆斯克，雅斯納雅波里雅納，或摩塞斯克的時候，我不斷地對自己說：

「……德國人在這兒逗留過，現在他們已經撤退了，十英里，五十英里，或一百英里。這是希特勒必敗命運的開始。我們的侵略者，戴着卍字的人，仍在波爾多，馬賽，斯特拉斯堡，布萊斯特，里爾——巴黎。他們仍在成千的小村裏——他們仍在從挪威到希臘一帶，從希臘到列寧格勒城郊一帶。然而他們要從他們偷入和劫掠的每一寸領土上被驅逐出去，就像他們已經從這小塊俄國的土地上被驅逐出去一樣。勝利在前進中。」

所以我在俄國解放區所見到的破垣蹂躪的悲慘景象在我心裏永遠和一種無限希望的感覺聯繫着。我所見到的簡直是一片淒涼：到處是燒毀的宅子，燒毀的學校，燒毀的教堂，燒毀的工廠，燒

毀的醫院。堅忍耐勞的人們用他們的手費了幾十年幾百年的功夫建設起來的一切被摧毀了，被破壞了。還有我聽到的一切——親眼看見隣人和親友被納粹槍殺或絞殺的俄國農民述說的納粹暴行——差不多是不能忍耐的。那比我想像的還壞，比我先前讀到駐俄記者發出的電報所描寫的還壞，然而受了無數痛苦的那些人們現在勝利了。他們會忘掉他們所有的一切，他們消瘦憔悴——他們高聲地咬牙切齒地咒罵「德國法西斯們」。然而——是的——他們是快樂的。他們自己的戰士把他們解放了。現在他們知道他們和他們後代兒孫要當俄國的公民而不是當德國的奴隸活下去了。

當我一頁一頁翻閱我從俄國帶回來的雜記簿時，解放區的嚴肅的景象便來到我的眼前，我能清清楚楚看見那個區域裏和我去談過的幾十個居民的笑容。我能聽見向我述說饑餓，奴隸勞動，和迫害的俄國人的聲音；我能聽見帶着熱情有時披着諷刺地向我述說他們愛國同志的英勇和在德軍佔領期間他們玩過的殺敵巧計的俄國人的聲音。每個蘇聯農民和每個兵士都堅強樂觀地對我說：「我們將來要獲勝，我們已經開始獲勝了。」

一月十五日星期四，我們四個人——一個俄國的汽車司機，包爾丁上校，米耶斯東中尉和我——坐了一輛俄國造的福特式汽車，汽車偽裝成白色，在滿佈各種軍用車輛的勒塞夫公路上奮力地走着。天正在下雪。

我們一到首都以西的曠野時，我便耐心地看着公路旁邊的木頭「農舍」。我知道這已經不再叫農舍了，但是看去卻在像舊俄小說裏的農民的屋子，小小的窗戶，很大的房頂，房頂上蓋着厚雪。這些欲墜的小木房子和它們面前聚集着致命的武器的公路上的情景成了一個奇特的對照，俄國造的重坦克，中壘坦克，裝甲汽車和載重汽車，重炮和輕炮擺成無盡的行列浩浩蕩蕩向着戰場滾去。

塔里薩是這條公路上第一個被德軍佔領的鄉村。我們過了那個最大的敵人前進的界線之後，景色完全改變了。炮彈和炸彈在凍硬的土壤上留下了巨大的痕跡。炮彈和炸彈毀滅了農民的房子。炮彈和炸彈破壞了工廠。炸彈摧毀了橋樑。現在我們看見的在路上或田野裏的許多戰車——坦克車或裝甲車——都是不動的，死的，冷的，而且蓋着一層雪罩……這都是第一次俄國反攻中的傷亡者——德國的和俄國的。

我們經過一所中了炸彈的磚瓦工廠。高大的煙囪的上部有四個大洞，沒有坍塌，還在那兒立着，好像一支殘破的纜索。我們開始看德軍退却時縱火燒毀的房子，燒毀的農舍。它們的木牆和木頂已經沒有了：除去俄國式的大爐子，和紅磚煙囪之外，什麼都燒光了。我們要想數一數被毀的房子，必須數那些煙囪和留在雪田週圍的籬笆。但比較容易也比較快的辦法是數那些完整的房子：在被蹂躪的維索科瓦村，一百四十一座房子裏，我數出有五座存活的。

在田野裏稀稀落落停着坦克車，我們偶爾也看到一架壞了的飛機的遺骸。許多穿着高統靴的

人們在搜尋地雷——實際是拿他們用以挖雪的一種長鉤鐵棒在鈎取地雷。不過最緊張的活動是在被毀的橋樑的周圍，那兒有許多農民和士兵在整修橋樑。農民用馬車從附近的森林裏運來粗笨結實的松樹幹。士兵和農民於紅軍工程師的監督之下在可怕的嚴寒和一片激動喧噪之中工作起來。他們工作的效率和速度真令人難以置信。差不多到處，甚而在剛剛收復的鄉村裏，我居然看見了新橋傲然地矗立着，重坦克和載重汽車已經在上面走了。在戰爭期間俄國已開始他們被蹂躪區的重建工作了。

我記得在公路上有一羣婦女，那是在伊斯特拉，一個被廢的城鎮，只剩三座房子。天正在下雪。在遮蓋了納粹許多罪惡的冬季雪毯之下，瓦礫慢慢看不見了。婦女們裹在被爛的衣服和圍巾裏。其中有一個沒有穿鞋，她的腳上只包紮了些破布和紙片。這些人一看見我的同伴的軍官制服便走近來跟我們說話。她們渴望聽到從前纔帶來的消息，渴望從我們得到一些愛護和同情。我在俄國解放區的任何地方都親眼見到農民們這樣自願地圍到一切穿着紅軍制服的人的跟前。

有個長着愉快堅決的面容的年青女郎告訴我在那些侵略者之中，曾經稍微幫助過她家的只有德軍裏的奧國人。她說：

「他們讓我們在逃入森林之前帶點禦寒的東西，他們警告我們不要走近他們的長官，免得我們挨打。那是多餘的勸告。德國人在我們村裏時候，我們不洗臉也不梳頭——我們想盡方法使自己顯

得更老些，爲的是使德國軍官和德國兵不理我們。」

她眼睛放着光，她解釋她保持着「蓬首相面」確實使她的樣子老了二十年左右。她說她被迫待奉納粹軍官吃飯時候她憤怒極了。她由不得「哭泣起來」。她又說：「有些高興的樣子：『在爲我們戰鬥員，爲紅軍士兵作飯洗碗時，我們是多麼歡天喜地地幹呀！……爲我們的戰鬥員，爲我們的天使，我們什麼都幹，什麼都幹。』」

還有一個女人在摩塞斯克和我談話，我到摩塞斯克是在德軍退走的第三天，她對我說：

「你那裏曉得我們看見第一隊紅軍的前鋒，知道了我們終於解放了的時候，我們是如何地哭泣呀！我永遠不能忘掉那個情景。我快樂，但是我受的痛苦太多了，我覺得我太微弱了以至喜歡不出來，我只站在那兒，我的心在痛，在痛。」

這個可憐的人悲悽地帶着一種動人的自然的信任神情抱住我的臂腕，眼淚從他憔悴的臉上紛紛落下，戰前她是個玻璃工廠工人。納粹劫掠了她的家，然後強迫她帶着她的幼小的孩子同全村的居民在戰線後邊徒步走了多少英里作無盡的遷徙。征服者向她們呼嘯好像對狗呼嘯一樣，她們若服從命令稍微遲慢一點，納粹就拿手槍威嚇她們，這個女人讓我看她的家人在悲慘的日子裏吃的東西；好像一塊乾泥的黑褐色麵包。她和她同伴在路上把雜有凍壞了的馬鈴薯粉的麵粉摻進去做熟了吃。對於這個女人，對於站在她身旁神色呆滯十分疲憊的幼小的兒女，解放不但意味着「自由」，還意

味着「食物」，還意味着「麵包」。

在拿破崙的記憶裏是個十分肥富的摩塞斯克……我在德軍一退走之後立刻看見了它，它在怒吼的巨聲和俄國反攻的普遍的生氣中是多麼動人呀。我的頭上，紅軍飛機不斷飛過，飛得十分低，飛往敵人的戰線去。在大街上，一個不斷的各種車輛的行列向戰場流動。在瓦礫和被炸藥炸毀的建築物中間有無數的坦克，裝甲車，大炮，滿載軍火的汽車，滿載糧秣的汽車，滿載常備兵的汽車。士兵在汽車上緊緊排着，裝着刺刀的步槍筆直地拿着，好像朝着天空的一片矛林。

在摩塞斯克我同戈佛洛夫中將在前三天還是德國軍官講德國話的房子裏吃晚飯。在摩塞斯克我會見了德國俘虜。我問這些沉悶的德國人之中的一個：

「你認為希特勒攻打俄國是對的麼？他這種行爲能給德國好處麼？」

這個皮膚黝黑的三十歲的德國人幾乎疲累得昏迷了，慢吞吞地說：

「就我們現在所見的來說，他是不對的。」

這個德國兵早在一九四二年和突尼西亞他的許多同志在一九四三年都知道戰爭的浪潮已經轉變了，懲罰希特勒的日子開始了。

我們遇到一列從前進陣地回來的俄國士兵，他們剛換防下來，要休息一個時期。他們在公路上

慢慢地移動；有的徒步，有的坐着馬車，有的坐着走得很慢的載重汽車。我留心地看着他們，想在他們堅定的臉上找點疲憊的跡象。我一點都不能找到。倘若有人告訴我這是開往前線作戰的生力軍，我是立刻就相信的。他們有和我看見的坐着快速的載重汽車開往前線的士兵一樣精良的裝備，只是他們的制服破了一點，髒了一點。每個人都把臉修得很光淨，神采奕奕，好似要參加檢閱似的。

這兒軍隊裏有婦女——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在前方服務的婦女。她們之中有些是軍醫和醫藥助手。其他的是輔助隊員；這些人大概作聯絡工作如電話接線生和打字員之類。她們裏有三個人穿着和男子一樣厚厚的軍裝，在露天裏，坐在一輛馬拉的炮車上。她們皮帽下邊露出紅潤的健康臉頰，似乎在冰天雪地裏享受坐在炮車上走的樂趣。她們從我們的汽車旁邊過去時候，她們三個人朝着我們這個方向投出自然而愉快的微笑——這是容顏標緻的女郎們的微笑，雖然在零下三十度裏，她們一點兒也沒有失掉美麗——這是滿目懷涼中的青春的閃耀。

下午我們很早就到了沃洛科拉姆斯克，這是個約有兩萬居民的小城市，大約在莫斯科以西八十英里，離戰鬥的地方大概有三英里。這個小鎮在十月二十九日被德軍攻陷，十二月二十日由紅軍收復過來了。

我們到了這個小鎮最後兩天克服的區域，我們左邊右邊，公路的兩邊有成百的被打死的德軍鎗在雪裏，和死馬破炮混在一起。下着的雪漸漸把他們都蓋起了。納粹退得太快，沒有趕及掩埋他們

的死兵——然而他們有工夫作了些別的事情：在許多僵硬冰凍的屍首下邊設了地雷，爲的是俄國人掩埋他們時候把俄國人炸死。包爾丁上校警告我任何一個死的都不要動他。

我從車裏出來，小心地走着，恐怕碰着德國的地雷，我走近敵人遺棄在戰場上的一輛戰車。那是個毀了一半的輕坦克，德國人躺在坦克的周圍。原來，死亡突然擒住了他們，所以他們亂七八糟地倒下了。一個是半裸體，肚向下伏着。他赤裸的背好似凍冷的硬臘。

另外兩個德國人是面朝天躺着，腿臂向四外伸着，好像壞了的洋囡囡的四肢。其中有一個是軍官，佩着鐵十字章。被凍結的血液弄得僵硬的制服說出德國對俄國冬季作戰的全部戲劇。這種制服是薄薄的毛呢，一個駐屯在法國佔領區的人穿上都難够保暖的，靴子是黑皮作的，又緊又小——正是把冷弄得無法忍受的東西。按我看見的德國人的內衣，也是薄的。其中有一個德國人在他的上身制服裏，腰部綁了一條毛圍巾，這種圍巾絕對不是軍用的，看去很像俄國婦女頭上帶的圍巾。

我們的車越走近戰鬥了，炮聲很響了。我們能看見俄國人發炮的陣地了。上校對司機說了幾句話，車便停了。什麼事也沒有，實在是什麼事也沒有發生，只是因爲我們到了我的嚮導紅軍上校不想帶一個外國女子——或者是任何外國人，不論男的女的——再往前走的地方了。

上校輕聲地對我說：「現在我們必須回去了。你不能再往遠走了。」
有個短短的時間我只站在那兒，站在俄國曠野的公路上，看着單調的雪田——我向西望去。

在那些雪田的後邊，在那後邊雪田的後邊有個被奴役的大陸，從俄國一直到大西洋岸。那兒有許多飢饉和遭難的國家，那兒有千百萬劫後餘生的男女和兒童巴巴地期待着解放者——聯合國的兵士，他們冒着生命的危險在準備於盟軍進兵之日以一切方法援助盟軍。

往西幾百英里就是我母親居里瑪麗的故國波蘭。往西千多英里就是我的祖國法蘭西。

我們掉轉車往回走。就在離德國人的屍首不過幾碼地方已經有了生氣了；俄國士兵在修理電線。從兩天以前才解放的米海洛夫卡小村來的兒童在路上滑雪，嘻笑。在每所免於毀滅的房子裏似乎都有人住下而且工作起來了。

一月十八日我又坐上了一輛汽車，我又在一條白俄羅斯的公路上，天氣又是很冷。這次我是一直向南。在一條寬濶單調的包爾丁稱爲幹線（Magistral）的公路上走。我是去看兩個富於英勇的紀念，同時又是俄國人心裏最珍愛的城市：一個是圖拉，沒有向拿破侖屈服，也沒有向鄧尼金屈服，更沒有向希特勒屈服，被納粹圍攻了一個月零十七天依然沒有投降的圖拉；另一個是雅斯納雅波里雅納，那兒是托爾斯泰住過而且寫作了多半生的田莊，被德國人佔領被德國人蹂躪了，後來又由紅軍收復了。自從紅軍的推進把圖拉解圍以來，我是頭一個到圖拉的外國人，紅軍重入雅斯納雅波里雅納之後，我也是頭一個到那個村子的外國人。

這次和我同行的有托爾斯泰的姪孫女蘇菲雅安得列夫娜托爾斯泰（Sophia Andreyevna Tol's-

fact)，她管理着俄國所有的托爾斯泰博物館；此外是剛剛正式受任負責整修被破壞了的雅斯納雅波里雅納田莊的莫斯科科學院明斯教授，米耶斯東和明斯教授的青年女秘書。我們被裝在一輛樣子嚴肅的舊式大汽車裏，由一位年紀很老的，怨語喃喃悲觀主義典型的司機駕駛着。

天氣非常的冷，我們的車駛經平坦的雪田和四零五散的疏林的單調的冬季景色時候，我們有好幾次把車停住，在公路上來回來去跑一會兒使我們的腳恢復被凍失的知覺。我們真是特殊的一羣：一個穿着花軟綢上衣的法國女子——我——不時加雜着說波蘭語，俄語，英語，和法語；一個年老的猶太教授，長着一副清瘦和善聰明的面孔，我覺得他很像黨人不大像個特派的歷史家；米耶斯東穿着她的紅軍制服和她的白羊皮上衣；沉默的小秘書有副孩氣而無表情的面孔，她一聲不響；還有我們都叫她「蘇菲雅安得列夫娜」的五十來歲的那個質樸尊嚴的婦女。她是現代俄國托爾斯泰紀念品的官方付託人，這裏邊意味是很多的，因為在蘇聯沒有一個著作家得到比托爾斯泰更多的讀者，沒有一個著作家和思想家得到比托爾斯泰更高的真正的崇拜。她的流利的英語，她的清晰的法語重音，她的委婉的態度，和若干細節，甚而穿着她的素淡的破舊的衣服（她戴着一頂帽子，她把手戴在鑲着毛邊的小暖手筒裏，一種很女性很「安娜卡列尼娜」似的風姿，在在述說着她過去的優雅），都顯露出一個在富裕的家庭裏由一個英國保姆教養大的女子，會是或者寧可算是一個伯爵夫人的女子。

我們更走近圖拉時候，我只從車窗往外看，便能明瞭圖拉被圍的情形和整個戰鬥的激烈。我們走過聯接莫斯科和圖拉的貫南北的公路和鐵路的橋。倘若希特勒征服了圖拉，他就確保了莫斯科與烏克蘭之間交通線上的一個強固據點。那麼他只從南再進一百二十五里就到莫斯科了。

我覺得蘇德戰爭最驚人的插話之一——圖拉被圍好像一個生動的可以叫作「英勇的效能」的表現：因為圖拉保衛者在從十月二十九日，直到十二月十五日的德軍進攻之下沒有屈服，而且繼續在許多軍事專家叫作「無望的」情形之下和敵人拚戰；一個三十五萬居民的城市終於得救了，一個大的軍事工業中心繼續工作，一條主要交通線得以保持。

我們停在共產黨黨部爲的是訪問支配四十個縣的圖拉省黨部書記薩佛隆科夫先生。他在被圍的緊急時日裏，當圖拉保衛委員會的主席。軍人，黨員，和單純的市民在這個委員會裏一起工作。然而今天不是和這樣一個忙人談話的適當的日子。在過去四十八小時裏，在圖拉正舉行一個美國人見了要稱爲「國會會議」的大會，擠滿了人的省黨部的情景是一片喧嘩之聲。自從德軍退走之後，這是第一次從各縣來的代表，大約有一千人——代表工廠，學校，各種市政的，軍事的，半軍事的組織，和黨組織。

天色晚了。我們走到黨部建築物地下室的大食堂裏，這個地方聚滿了「代表」，從圖拉省每個角落來的男男女女。食堂裏不通風而且喧吵，好像美國沒有侍者的平民食堂。這兒賣的食品是簡單

的——一種滾熱的蔬菜很多的湯，裏邊有幾小片肉，麵包和茶，在圖拉似乎比在莫斯科食品多——或者還是黨部得到了特別的定量分配呢？在蘇維埃飯店裏，蔡菲雅安得列夫娜，米耶斯東，沉默的小秘書，和我得到一間屋子住（屋子裏有五個床，我們只用四個，還有一個小洗面台，我們可以放出點兒冷水洗臉），一位美麗的衣着很好的女侍者又給我們送來一些食品——這次是豐美的，「節日」似的食品——一定是爲我特別作的。

晚上有幾個使者突然進了這間五個床的屋子。我們要證實我不願無盡無休的等待，我還想見薩佛隆科夫先生，這位神秘的圖拉共產黨書記，他們告訴我他「會兒就有時間了。我在蘇聯短期的逗留教給了我俄國的效率是巨大的，但和守時刻毫不相聯。」

十點二十五分，一輛官方汽車在飯店門前發出大的噪聲。一位先前我沒有見過的使者氣喘吁吁地跑了進來說薩佛隆科夫先生有了時間，在等着我。我疲倦極了，我覺得有點兒眩暈：我彷彿在夢裏走。我進了薩佛隆科夫辦公室時候我把這個坦白地告訴了他。那兒除了他以外，還有四個穿着制服的沉默的軍官在等着我。他們告訴我：「我們永不睡，我們白天和夜裏都工作。在這個辦公室裏的我們這些人，在過去三個月裏沒有一個人一夜睡過五小時以上的。」如此給了這位青年領袖一開始就堅定地建立起一般地說是俄國人民，更確切地說是圖拉的公民比全世界其餘地方的居民卓越

的機會。

薩佛隆科夫是個年青高身的男子，十分漂亮，長着一副表情遲鈍的面孔，他很端正地坐在一張沒有漆飾的辦公桌的後邊。他說話慢，聲音大，儼如對一羣人講演。他的話清晰，雄辯，存心不說某一個人如何如何。他從不說某件功業是某個特殊的人完成的——不論是他自己或者是別人。他要圖拉的全體居民，全體紅軍，和全蘇聯的人民得到他說的任何英勇行爲的美譽。他是個典型的共產黨人，是社會主義國家一個完美的公僕。同時他也是個熱烈的俄國愛國志士。

許多個月以後，在堪爲史詩的史達林格勒戰役期間，我想起薩佛隆科夫在圖拉回答我的問題時的話——「一個人怎樣拯救一個被圍的城市呢？」記住他說話時狂熱的和喜悅的聲音：

「第一，而且要在一切事情之前，一個人要用立誓不讓敵人進來以拯救一個被圍的城市。這似乎荒唐，但是一點也不荒唐。在蘇德戰爭裏有過許多次軍事領袖開始給一個地方建築防禦工事，同時他覺得這個地方終於要投降的——他們在心裏已經放棄了這個地方。像在圖拉我們遭遇這種情況的時候，最重要的是正視艱難，決心寧死不屈，一絲一毫都不動搖。最偉大的抵抗原素就是這個抵抗意志，負責的領袖和一個城鎮全體居民共有的意志。在圖拉我們有了這種意志。你看，我們很以我們的傳統自豪。我們挨次地抵抗了拿破侖和鄧尼金之後，我們確實沒有把圖拉拱手奉給希特勒的念頭。」

這位年青的圖拉保衛委員會主席開始向我描述圖拉被圍了。他描述了一點之後，稍微停止讓我想想我是否確實明白了，然後繼續有條理地描述他心裏想起的第二點。屋裏的四個紅軍軍官不時點頭贊許。

時間已經過了中夜。話談得入了迷了：現在談話的節拍比較地慢起來了。在我的問話和他的答話之間及他的答話和我的下句問話之間有了較長的靜默。我恍惚奇怪這是怎麼回事呢。我看我的主人：他還是端端正正地坐着，他的肩膀裏，他的脖子裏有種特異的堅強。我突然問對他說：

「不論你先前怎樣裝作，你大概也像我們一樣——非常地暈了罷。」

他顯出疲弱了，僅僅一刹那，帶着緊張的微笑和羞地說：

「是的，我很疲倦了。」

因此我喜歡他。我立刻知道了——沒有人告訴我——這個人整天整夜整星期極忙碌地工作着，在勝利的那天來到之前他要繼續這樣工作的。

第二天早晨燦爛的陽光使我相信天氣不大冷了，可是幾分鐘之後我很快發現了今晨的嚴寒甚而比昨天的更爲刺骨。我們出城時最先經過了街市障礙物，然後經過了圖拉前進防禦陣地的戰壕和設防的碉堡，後來到了被蹂躪的煤礦。在德軍佔領過的那個區域裏我們發現了熟見的悲慘的景象：焚燬的房子。我們又經過了些房子，然後是田野，再後是森林。在離城市幾英里的地方，我們離開了

一直的公路，向左拐入一條彎曲的鄉間大道。這條大道引我們到了一座小山的山頂，引我們到了一片白雪與疏林的奇異的景緻。蘇菲雅安得列夫娜突然輕輕地說，她的聲音簡直掩不住她心裏的情緒：

「那兒是雅斯納雅波里雅納……那兒，在山谷的那一邊，從這兒你能看見公園，也能看見果木園。你能看見那個田莊的邊緣。」

我們一走過頭一行樹便看見名叫雅斯納雅波里雅納的那塊地方的全景了；原來托爾斯泰學校的現代的方形建築物巍然立在田莊及其左邊的鄉村中，現在這個學校已成了一片梳日驚心的廢墟。它沒有房頂，只有燒黑了的高高的牆壁上留着的窗口。再遠一點有個焚燬的醫院和一座焚燬的老人之家。

我突然心裏確實充滿了對納粹侵略者的憤恨。我不明白我在解放區裏隨處見到的這種單調的有系統的蹂躪的動機。爲什麼燒，燒，沒完沒了的燒呢？爲什麼呢？爲什麼侵略者的瘋狂要毀滅人類的建築呢？爲什麼要被毀像這樣的一個地方呢？

在德國人一切破壞行爲之中再沒有比破壞雅斯納雅波里雅納的象徵的鄉村惹起全俄更大的憎恨的怒濤了。在蘇聯托爾斯泰不但是個作家而受到崇拜，並且是在沙皇統治下成了農民和無特權者熱切的朋友而受到崇拜的。差不多每次我向一個俄國士兵，或者一個軍官，或者一個工廠裏的

工人，或者一個商店的店員問到我在蘇聯應該看看什麼地方時候，我得到的回答都是一個：「到雅斯納雅波里雅納去——你回到英美時候把德國法西斯帶對於托爾斯泰的家幹了些什麼告訴每一個人。」

我們更來近托爾斯泰的房子和早先是馬廐的低矮的建築物了。這些房子比焚毀的鄉村學校情形好點：從外面看差不多是完整的，托爾斯泰博物館的管理員是個高身量長着鬍鬚的男子，穿着傳統俄國式外衣和長統靴子，管理員的姐姐馬麗亞蕭哥列娃是個富於感情的五十來歲的婦女，他們兩人歡迎我們，吻蘇菲雅安得列夫娜的兩頰。

我們從一個後門進去，到了一個很小的廳堂裏，什麼陳設也沒有而且冷得要命。馬麗亞蕭哥列娃會說點法語，她告訴我托爾斯泰的書，文件，畫片和陳設在德軍進攻以前的兩星期左右大多運往西伯利亞去了，其餘的在德軍到了之後由她集聚在一間房子裏（這間房子還貼着封條——由德軍最高統帥部查封）我在這間房子裏看見了幾件零亂的陳設，畫片運走而留下的空框架子，和兩架大鋼琴——這是鋼琴家高爾登威塞爾和其他有名的藝術家常在托爾斯泰屋子彈奏的鋼琴。

我在底層的房子裏看到了托爾斯泰寫「安娜卡列尼娜」的屋子，現在完全空了：德國軍官把它作了飯堂，他們佔領了這個田莊四十五天。我進了用白色拱廊支持着低矮的天花板的可愛的書齋，托爾斯泰在這裏用了很長的時間寫他的「戰爭與和平」。然後我上樓看他的臥室和小小的圖書室。

窗戶已被破壞，空處塞滿了乾草。在圖書室，托爾斯泰的屋子和他妻子的屋子裏，地板被火燒了一些大窟窿，周圍是燒焦的黑木頭。德國人在這些屋子裏點着火，想把整個宅子都燒掉。

我們下來走到棕樹小路上，穿出了門，離開了托爾斯泰的宅子。我們走入一條通往山頂上學校廢墟的小路。我在毀壞了的房頂下，在淒慘的瓦礫堆裏徘徊了一會兒。這個學校是在一九二八年設立的，曾經是個優美的建築物：它能歡迎幾個村子的兒童，如今這兒成了使托爾斯泰看見都感覺絕望的淒涼。倘若這位作家活着，知道了納粹會企圖毀滅他的住宅，也許比今天他的狂熱的俄國的崇拜者沉靜——這個宅子，他珍愛過，但是也幾次離開過，因為他以作爲一個富人住在裏邊爲恥。他所不能忍耐的是加諸這個鄉村，這個學校，這些兒童，和他愛的質樸的人民身上的殘暴。

米耶斯東進了首都飯店我住的屋子裏，她很着急地說：

「艾美……我們必須立刻離開莫斯科！羅索夫斯基先生（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剛才從古比雪夫給這兒情報部打來長途電話。他記得你須在某月某日回到美國，他叫我通知你從俄國往伊朗飛行的下一班飛機就在星期二由古比雪夫起飛——就是後天。羅索夫斯基先生的話把情報辦公室的人都弄得莫明其妙了，他說：『倘若居里小姐是在前方，你必須到前方找着她，在星期二早晨之前把她帶回古比雪夫。要注意叫她立刻搭上運輸機。』」

我應該深感這種盛情。可是我不願意倉皇地度過我的旅程，普通戰地記者在申請飛機座位之後往往要在蘇聯等待若干星期。然而想到我這樣突然離開莫斯科，我感覺特別悲愴，我捨不得離開我已開始喜愛的一個城市和會以友誼和很大的信任來歡迎我的人民。最使我難過的是我不願意離開聯合國世界中的這塊地土——在這塊地土上我看到了一切人民一心一德地進行着全面戰爭——不是百分之四十，不是百分之六十，不是百分之八十，而是百分之百的——在這塊地土上我注視到令人極度興奮的氣象是對於這個戰爭中的國家，任何作戰努力都顯不出是太大的。

飛機上給米耶斯東和我留了兩個位子。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一我們離開莫斯科。我們在充滿燦爛的陽光的天氣裏飛，這種天氣使跑道上的硬雪閃耀，飛機從古比雪夫來莫斯科時滿載軍官。回去時候滿載着劇人，因為他們在各城市的戲院和歌劇院挨次表演，他們有乘坐飛機的優先權。他們愉快，愛說話。飛機在薩拉托夫降落，他們下去幾個；然後飛到古比雪夫。米耶斯東和我下了飛機後隨便坐進一輛汽車，從飛機場駛到城裏。

我一面在古比雪夫等待德黑蘭來的飛機，一面盡可能地在波蘭大使館消磨我的時間，波蘭大使館在薩巴耶夫斯卡斐街的一所小房子裏，波蘭大使科特把我當作一家人來歡迎我，在那兒我可以說波蘭語，不必說我的十分洋涇浜的俄語。每次我經過這個房子的門的時候，我就進了一個非常悲

裏的世界。除去大使館人員而外，我在那兒遇見的穿制服的波蘭人作了蘇聯的戰俘已經若干月了，後來他們加入了在蘇聯的新波蘭軍隊，成了蘇聯的盟友。

自從這次戰爭開始以來，這是我第六次和波蘭軍隊見面了：真也奇怪，我從未能夠看見他們的地方就是波蘭本土。一九三九年我沒有親眼看見波蘭人在自己的國土上拚鬥，沒有親眼看見他們不可磨滅的保衛華沙——我母親家裏還有幾個人住著的華沙。我沒有看見波蘭軍隊因為缺乏現代武器而被消滅，而成了過去的東西。

在薩巴耶夫斯卡雅街上這所靜寂的小房子裏，我有時和科特大使，波蘭軍官及士兵坐談幾個小時。一天下午，我正和大使談話時候，他被請到第一層樓的另一間辦公室裏。一會兒他回來了，他對我說：「這是你必須去看的東西，一個青年男子，一個著名的波蘭作家，從集中營逃出來，剛繞到了此地，將將到了此地。從他的集中營到古比雪夫一路都是走着的。他要使你發生趣味的。」

我們到了新聞室。新來的人正在那兒和館員們談話。他的樣子使我停止了呼吸，我幾乎不能跟他說話或者問他什麼了，我只坐在那兒，靜默地看着那個人。他瘦，髯，好久沒有刮臉，彷彿疲憊極了。他的凹陷的兩頰，發燒的紅色，表示了他的沉重的肺病。他的衣服——倘若這是個適當的字眼兒——簡直是好萊塢的導演給一個扮演叫花子的演員設計的。那盡是窟窿，四周圍只有一點點布。三四種布塊好像寒酸的纏纏掛在這個病人的營養不足的身體上。他現在吸着一支很貴的紙烟，

這是剛才送給他的。

誰說的話都不多。在俄國，在死裏逃生的波蘭人中我學到了一種特殊的抑制。受了極端苦難，忍過了這種苦難而且本着自己的意志來和他從前的獄吏聯合進行抗德鬥爭的人們不希望一個不速之客高聲批評他們新近的不幸。我想他們還覺得這種行爲是輕舉妄動呢。

所以我們只和這位衣服藍襪的人在大使館的新聞室裏坐着。我們簡直沒有說話。最後大使打開話頭把這種形勢作了一個幽默的結束，在他的幽默裏拚命隱諱這位得到解放的囚犯病得多麼利害的樣子。他說：

「那麼，我的可憐的人，我們想——我們應該使你再完全夠個樣子，這是費不了多大力氣的。我們必須給你弄雙鞋——到那兒去弄，我不知道，但是我們必須從某些人身上擠出一雙來。然後是褲子，當然沒有褲子你是不能出門的，然後是上衣——跟我兩天，我準保使你完全成爲一個紳士的樣子——我敢說我就開始踐約！……」

這位病人看見我們沒有把自從一九三九年以來他經歷的可怕的悲劇過於戲劇化，似乎放心了。他對於這段談話感到了興味而且說，幾乎是道歉的樣子：

「啊，大使先生，你千萬記住：我離開華沙有點兒太倉促了——只穿着我的網球衣。」

亞洲

現在我離開了俄國的冬季和俄國的戰爭。我已不在雪裏走，而在德黑蘭乾燥的大街和公路上，在褐色的土地上走着。一個月來我第一次感到不是刺骨的寒風而是溫柔的陽光射在我的肩上。我又穿上了絲襪子，又不穿大衣隨便地走，又能乾淨能好好洗一洗，又能進飯店裏吃一頓美餐，或者走進擺滿貨物的商店，似乎是神祕了。又看到了幾個可愛的朋友是愉快的。但是回到安全的非交戰的伊朗，我沒有感到輕鬆。當我從一個辦公室走到另一個辦公室，從一個大使館到另一個大使館爲了解決我到遠東的繁雜的運輸問題時候，我得到了行動呆滯，拖延，被動的印象。我自言自語說：「這兒的人怎麼回事呢？有什麼變化呢？一個月以前我還在德黑蘭，我看見許多人在工作，很謹慎地作他們的事情，……發生了什麼？」

除去我到了俄國又回來了之外什麼也沒有發生。我離開開把戰爭當作他們全部生活的蘇聯男女，現在我正會見盟國的朋友——不說中立的伊朗人——他們正爲戰爭工作，是的，然而他們仍在保持跟平時差不多的慣例的生存。蘇聯男女和他們是驚人的對照，給予我的影響好比是突然間沒有了氧氣的窒息。我忍不過的是支配着德黑蘭活動的那個難堪的時間表。悠久的午飯時間裏辦公室沒

有一個人，吃茶時候沒有一個人，吃茶之後和晚上，辦公室又往往關復長時間的門。盟國軍事代表團裏有些人是這個規則的例外，他們工作時間很長。

碰見一個平民在工作真是一件成就，當我果然碰見時候，這個人的友誼的反響往往是請我吃飯，吃茶，飲酒，吃大餐。我奇怪——毫無感謝地——我們爲什麼總是吃，喝，不論戰爭不戰爭。我想呆頭呆腦地向我遇到的每個人大聲地說：

「我不想吃。倘若某某太太請我喝酒，我毫不放在心上。告訴我，你是否要爲戰爭作點事情。善但是幸而我沒有這樣大聲地說，而且能在十分神氣的人們面前設法「自抑」，這些人們不管他們效率如何，他們彷彿顯得比我更有用。但是我仍然感覺十分憂悽和沮喪。這完全是俄國的錯。戰時俄國使我沉醉在狂熱裏，所以離開俄國以後，我走路說話都必須小心，我彷彿是個漸漸「清醒」的醉鬼。

我們離開了伊朗，進了伊拉克，來到沙台爾阿拉伯河的上空，河裏聚集着大小船隻，英國兵營的帳篷數以百計。飛機在巴士拉機場降落，我因爲景仰舒適的沙台爾阿拉伯飯店之名所以立刻在這個飯店下榻了。這個飯店一面向着飛機場，一面向着飛船降落的河。我急忙到了休憩室裏，裏邊盡是吃茶飲酒的英美軍官，我問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經理是否從開羅得到了關於我到新加坡的電報。他果然得到了電報——但是開羅已發出信號說目前旅客只能訂到加爾格答的座位——我也是如此。

我執拗而愚蠢地認爲其中必有誤解，我堅持要到馬來亞，我往開羅打了個回電。我簡直恨不得給照和打個電報要求他命令他的軍隊在東方不要這樣快地前進呢。

我必須等候飛船等兩天的工夫——結果等了三天。

第二天我看到了「伊拉克某地」，美國波士頓式轟炸機下船的地方和裝配的地方。大約有十五個機械師，他們的手被油弄黑了，在每架偽裝的，有個雞蛋形座艙的波士頓式飛機的周圍工作。其中有一個人說最苦的工作是擦掉在海程中保護機身的特製的臘衣與剝脫黏到小螺絲上和飛機每個凹槽裏的黏帶。「那是種厭煩，容易，令人發瘋的工作，」他說——他接着又說，用一種難辯的眼光看着我：「那種工作叫女人去作正是公道的。」

巨大的飛船從開羅來到了，差不多和一架飛剪號一般大。它的名字叫卡米爾。在天快亮之前我們起飛了。

在喀拉齊飛機場有一個哩標石，上面寫着：到亞力山大二千五百四十英里，到得爾班六千九百七十英里，到倫敦四千九百十五英里，到新嘉坡三千三百八十六英里，到悉尼八千一百五十七英里——這使我感覺到離那兒都遠得可怕。我們的飛行是個疾速的飛行，現在來了進入印度的例行手續了：文札，護照和簽證的懷疑的檢查。這足足用了一個鐘頭。我坐車到了飯店時候天已黑了，飯店

裏擠滿了英國的軍官；這時他們正在走廊裏看晚報，喝東西，在我走進我的房間之前，店夥遞給我一張通知片。「上午二時四十五分叫你，你的行李必須在三時十五分放到你的門前。」我要一份夾心麵包，一個浴室，一張床。我不能看見喀拉齊。今夜對於印度我什麼都不能看見。我太疲倦了。

但是甚而我的提包還沒有放在桌子上，我的土色無邊女帽還沒有脫下時候，便有人敲門了。三個皮膚黑色眼睛發亮的印度人進了屋裏；熱烈地問候我，穿着一套好萊塢式的熱帶衣服，肩部特厚的最年青的一位說他們是印度記者，他們剛從店簿上發現我的名字——他們問我能否准許他們為他們的報紙作一個幾分鐘的訪問記？他們不等我的回答，便從衣袋裏拿出拍紙簿和鉛筆，坐下了。

我們談美國，中東，俄國——日本。爲了停止他們問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看見了日本人的進展，你們是怎樣爲你們的國家焦慮呢？」結果真是非常的。兩個比較年青的同時開始說了——不是說，而是喊叫——印度人反對英國的不平之鳴突然一齊擺到我的臉前了。

我還沒有去看印度，但是印度來看我了。就在我到了喀拉齊十分鐘之後，印度民族主義像炸藥似的在我的屋子裏爆發了。過了三個小時，已下午十二點，我仍然坐在我的牀上，無邊女帽仍戴在我的頭上，想分析還在喊叫辯論的這三個印度人的不平之鳴。我們都很疲倦了。我什麼東西還沒有吃——而且離兩點四十五分他們叫我的時間已經不遠了。

後來我知道了我的喀拉齊三個朋友是典型的有政治頭腦的印度人，國民大會的支持者，穿着好萊塢式衣服的青年是個極端的民族主義者，他對於英國人的憎恨和印度人統治印度的要求不容你有冷靜的思考，弄得話也不好談。他熱情有餘，明智不足。然而他是雄辯的，態度是憤激的。他當然埋怨邱吉爾，他也埋怨羅斯福沒有在大西洋憲章裏明白提及印度。他帶着顯明的滿意的樣子向我說明英國正在東方節節敗退（這完全是真的），一九四〇年英國得救「純是僥倖」，英國現在「利用俄國給它打仗」。他說印度不能自衛，因為印度軍隊被調往國外給英帝國作戰去了，還因為英國人怕印度軍隊裏有高級的印度軍官。但是幾分鐘之後，他輕蔑地描述印度軍裏的軍官和士兵是「只因需要麵包才作戰的可憐蟲。」他完全知道印度總督和印度軍總司令魏菲爾所領到的薪俸數目，他確實願意印度軍的薪俸減到沒有薪俸的程度。

這個激昂的青年只有一次感動了我，給了我印象。我向他引證在俄國俘虜營裏拘留了幾乎兩年的波蘭人現在準備同俄國軍隊對德並肩作戰的例子。這個印度人的黑眼睛越黑越激昂起來。他說：「雖然波蘭完全被佔領了，波蘭士兵在偽一個自由的波蘭而戰，而且事實上這樣一個波蘭正在產生着。倘若他們不是為他們的自由而戰，這些波蘭人還肯作戰麼？」

對於這個我沒有回答。他是對的。

我在印度的第一晚上沒有白過。我得到了過量的印度民族主義的藥劑，吃下去幾乎使我站不住

的樣子。我到了酒關人散的飯店的餐廳裏，要了一塊冷的陳雞雞和幾個月來頭一次的一大瓶威士忌酒及蘇達水。

我需要這種東西。

我們的飛船規定在一天之內橫過全部印度——簡直是橫過一個二等的大洲。這就意味了我不能多看印度；我們走得太快了。我們起飛時天還未亮，我在飛船上入睡了。

一輛汽車把我們運入加爾格答的市內，經過了城郊的破爛的區域和貧民窟。每個建築物，不論新的舊的，似乎都因為經常溫熱的溼氣而生霉了。在英帝國這個最大的第二個城市的城郊的公路和大街上，我第一次看見不是一個印度人，也不是兩個印度人，而是許多許多的印度人！極度的多數：成羣的男子和青年，大多赤腳，有些是半裸體的，有些是四分之三裸體的，有些只是小的局部裸體的，按照他們用各種樣式在他們褐色的身體周圍遮擋的白色粗棉布的長度可以辨別階級的條規。幾乎見不到女人。男子有美麗的紅銅色的面孔，上邊配着黑色放光的眼睛——高傲，敬懼，敏感，但也非常軟弱而帶着作夢的神情。最初在加爾格答的幾分鐘裏，好像一個突然的衝擊似的，給了我一個印度人口密度的印象，印度人不可勝數的印象。

只有沙色的牛，樣子很幸福和營養好，沒有任何憂慮和壓迫，而且是完全獨立的，它們沒有人護衛，在街心和人行道上逍遙自在地走，若有什麼事物引起它們的興趣，它們便懶洋洋地停住，到了厭煩時候就急步走開了。它們知道——噢，很知道，而且有一種牛的許多世代相沿的知識——在印度它們是神聖的，不論它們作了什麼，沒有人敢動它們。它們不但信任人類，而且還叫人類伺候它們！有些牛脖子上帶着雅緻的花頸飾。

我們到了大東飯店，飯店很吵噪，很華麗，而且秘密受着一種不健全的煽惑的攪擾。雖然日本人還離得遠，恐懼已經觸及了加爾格答。飯店裏有幾個侍者已經離開了市區，離開了對於穿着晚服的顧客能進四十道不同佳餚的豪華的餐廳。我走近了新的敵人——日本人——的最初的徵象就是那天夜間的全市燈火管制，在一些建築物前面能够看到的磚石的防護——隱隱中的不安。

在加爾格答我過了無法忍受的四天，設法離開它到更遠的地方去。

我求見了多少人！我到了多少辦公室！日軍在新加坡登陸的前夕，我和英國朋友在著名的星期六俱樂部裏吃飯。人們給我解釋我所以能在那兒吃飯，只因爲我是個俱樂部的職員們邀請的罕客。這兒的俱樂部正如在美國的考究的俱樂部一樣，只要血統裏有一絲顏色的男女就不准穿過這種俱樂部的大門，在桌旁伺候的有色人種的侍者當然除外。我想到這些幸運的人們這樣把他們社會生活的無聊和空虛隱藏起來不讓印度人民看見真也够聰明了。

到了二月十二日星期四早晨，我最後的拜訪是見新聞檢查長了。在我上飛機之前，他要把我的一切文札都看過。自從我離開美國以來，我已積累了許多筆記。他一件件都看過，疊起來，放進我的文札箱裏，然後把文札箱用堅實的繩子捆起來，在每個結頭上蓋了一個紅的印章，最後他留下了這個小箱，告訴我可以到飛機上去找。在飛機場又費了一小時受海關檢查，檢查了我的許可證，護照，照相機，膠捲，健康證明書等。

飛機駕駛員是個美國人，另個駕駛員是中國人，此外還有個有點兒太美國化的中國女職員，我們起飛了。

在仰光，有個名叫克萊伯的能幹的澳洲人，他是交際處的職員，原來也是個新聞記者，他在半小時之內就給我辦妥了駐緬甸的戰地記者的證明文件，並且告訴我當天就可以動身到前方去。

護送我到前方去的印度軍官尼亞爾大尉來找我的時候，我已快準備好了。在一列東行的軍用車裏尼亞爾和我佔了兩個座位。我們先到底吉和西富河口與薩爾溫江口之間緊臨海岸的小城市凱克托。從那兒我們再乘汽車到前線司令部去。

我們坐下之後還沒有五分鐘，我的好說話的同伴便開始把他的軍官生活告訴我。他是個馬拉塔人（住在印度西部和中部的民族），戰前當新聞記者。他立時承認他贊成印度的民族主義運動。然

而他是特殊型的民族主義者：親聯合國的那種。他決定站在英國方面參加戰爭，所以自願加入了印度軍隊——他顯然很引以自豪的軍隊。這位青年軍官用激動的聲音向我描述他的選擇所得到的報償，白種人的膚色偏見加諸他們的卑賤的羞辱。雖然他對於交際處裏他的一般態度友善的同事們沒有怨言，但是統治東方的不成文法使他差不多天天感覺偏促不安。美國的新聞記者請他吃飯，他們一走進飯店裏就發覺仰光最時髦的飯店正如美國許多飯店不招待黑人一樣不賣飯給印度人。有次軍官宴會在一個俱樂部裏舉行——這位年青的印度人未得進去。尼亞爾告訴我這麼一次兩位階級比他高的英國軍官如何離開了一個宴會上的人，而且對他說：「來，上尉。俱樂部這兒太壞，我們到別處一起吃吧。」我感謝他們友誼的表示——「但是，我們三個人離開別人孤孤單單地好像受懲罰的孩子似地吃，無論如何是更爲糟糕的。」

我們把堅硬鋪位鋪排好，睡了幾小時。早晨兩點鐘我的同伴把我叫醒了：我們離凱克托不遠了。火車站沉沒在燈火管制的黝黑裏。一會兒，在我們下車以後，一個手電筒向我們臉上投射暗淡的光線，而且有個男子的聲音說：「尼亞爾上尉麼？」司令部的一個少尉接我們來了。在黑暗中他看不清我：我想他只大概看見了一個穿着褲子和軍用襯衫的人。當我用毫不錯誤的女性的聲音向他寒暄時候，我感覺他彷彿目瞪口呆地靜默起來。我們把我們的包裹裝入一輛車站上的四輪貨車裏，在墨黑的夜裏探着路走，車上沒有頭燈，在不平的公路上慢慢地走了幾英里。最後我們到了我們要

逗留的軍官宿舍。在我們走進屋子之前，少尉請求我們千萬不要作出大的聲響：裏面的屋子內約有十二三個疲倦的軍官入睡了。

我們用脚尖輕輕穿過門廊進了一個狹窄的廳堂。我們的嚮導小心地把前門關閉之後，把一盞燈開亮了。現在我們能看見彼此的面孔了。這位年青的英國人莫知所措地注視我。小聲地說：

「現在我們實說罷。我們等待尼亞爾上尉和什麼前鋒論壇報的戰地記者一同由仰光來。戰地記者這個小伙子怎麼了？」

我解釋我就是這個「小伙子」。總是聲音低低的，不至於吵醒別人，這個英國人啞聲嘆氣說：「但是——但是你看，我們不知道，我們一點兒準備也沒有呀。我們——唉，這是個男子的房子，我們都多多少少地在地上睡。當然，我想我們的客人也要在地上睡的。但是現在我不知道該怎樣安置你。」

我試着勸阻主人把他稱之爲「牀」的東西借給我，但是無效。當我發現這個「牀」是一塊像地板一樣硬的粗木頭時候，我的躊躇也消逝了。我想得到一個單間屋子，不拘多麼原始和小，省得把我放在一個「宿舍」裏。我不管我的髖骨和背骨如何猛烈地抱怨我，我在木板上一直睡到天亮。

那天我聽了許多直接的叢林戰鬥的敘述。這些敘述確實證明英國士兵和印度士兵都頑強勇敢地戰鬥。但是這些個人英武的故事一點兒沒有使我對緬甸的最後命運放心。這種戰鬥好比一個有良心

的醫生努力救治徵候早已判決無救的病人。

英國的領袖們還在要求他們的士兵作戰鬥的姿態，然而他們是沒有信心地在這樣作。他們知道他們失掉了空軍的支援。災難是不可避免的。結果是英印士兵個個盡職，可是沒有真正的「決戰」。

我記得我在蘇聯視察圖拉時候。我記得年青的共產黨領袖薩佛隆科夫堅強熱烈的聲音，他告訴我：

「第一，而且要在一切事情之前，一個人要用立誓不讓敵人進來以拯救一個被圍的城市……：最偉大的抵抗原素就是這個抵抗意志，負責的領袖和一個城鎮全體居民共有的意志。」

在緬甸，這樣多的英國人——士兵和平民——對我友好，這樣多的英國戰士的確在緬甸撤退時期表現了最大的勇敢。我簡直不願意寫出在仰光和畢林前線使我最驚愕的現象。這現象是：我在那兒見到的英國人大多在東方住了好久，而且自戰爭爆發以來就沒有回英國。我感覺，也許是愚蠢地感覺，我能告訴他們許多關於他們本國的情形；只因我在倫敦度過閃閃時期，我現在比他們自己更瞭解英國——我指的是「血，汗，淚」的英國。當我從坐在俱樂部裏品吸「美酒」的頑固的文官跟前走過時候，當我和那些依然認爲作戰是時髦而裝模作樣空談愛國的軍官們談話時候，我很想對他們每個人說：

「喂，先生！你的鐘已經停了，你必須把它上緊絃叫它走起來呀。現在不是張伯倫的英國，也不是張伯倫的戰爭。現在是邱吉爾的英國。你戴着你的衰敗的勢力行爲和你的懶惰，看去你比一個戴着一頂兩年前舊式帽子的女人還不合時尚。」

太晚了！後悔已經太晚了。每小時廣播電台都有暗淡的消息報告。狂熱的日軍正向仰光壓進。瓦城已經被炸了。到東海岸的鐵路已被切斷了，那就意味着現在只好用滇緬公路把存在北部的供應品運往中國了。

在臘戍的每個專家都拿着鉛筆和地圖忙碌地努力計劃從印度到重慶的新路線。我的中國的朋友會養甫也是這麼忙着。這個人知道敵人不久就能從後面進攻他的國家，按理他該是陷於驚慌沮喪的狀態之中的。不論他心裏如何，他的愉快的面容上一點顯不出來。會博士是屬於無論什麼事情發生總是微笑的那種中國人的類型。他向我描述現在探索的把被封鎖的中國和外界聯絡起來的路線時候，他的黑眼睛的眼角和嘴角都露着最光明的笑容。

「那麼密支那這條路將是經由緬甸供應中國最後的一條可能的路了？」我低聲地說，我沒有自信。我以爲甚而那個不可靠的解決都要證明是不能實行的。緬甸是失敗的國家；援軍沒有到，仗沒有打，沒有及時採取決定，鐵路是白修了，通路是在可怕的遲延之後才開闢的。緬甸是禍對我們心

憐的國家，敵人能滲透進去，我們不能滲透進去。

曾博士投到我身上的閃耀的目光——和善的，諷刺的，大胆的，忍耐的目光，教給了我關於中國人的堅忍的第一課。這個矮胖的男子輕輕地回答，彷彿他在向我說一個好笑話：

「起初中國從香港那條路獲得供應品。那條路被切斷了。於是從滇越鐵路獲得供應品——那條路也被切斷了。然後中國經由仰光獲得供應品，現在那條路又要被切斷了。但是，居里小姐，每次新路線消失了時候，我們就找到了另一條，倘若必要，還再找一條使中國繼續作戰。當談到緬甸或其他任何地方時候，我們永不說：『這是最後的路。』你知道，因為在『最後』之後找出一條路用是我們的責任呀。」

我從未到過中國。半夜裏飛機急忙在昆明降陸增加了我生疏的感覺。在黑暗中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物是屋頂的樣式，屋頂的末端像睫毛的向上的優美曲線。第二件是中國男子穿着的棉袍的深藍色，他們在這樣的深夜時分擁在燈光輝耀的商店裏和茶館裏。我們走到一家入口極端複雜的飯店：一個對於汽車簡直是太窄的街門，後面是接聯的兩個院子，院子裏擺滿了裝飾的岩石。我們是飢餓疲倦的人羣——但是沒有吃的，沒有現成的屋子。

多虧常住在這家飯店裏的一位名叫貝爾尼的年老的英國人和他的同伴——一位高身量漂亮的男

子，很少說話，我猜他也是個英國人——幫忙，我們才得到一罐沙丁魚，一塊臘腸，一些麵包，半瓶威士忌酒，和點兒溫熱的飲水。我們又餓又累，我們開始吃起來，突然間，我猜是「英國人」的那個男子小聲地招喚我，那時，除我而外誰都聽不見，他聲音低得幾乎嘴唇都沒有動。他說：

「起初我不知道你是誰。我在這兒遇見你是多麼幸運呀！我用一個假名字來到自由中國好幾天了——但實際上我是在日本佔領的越南寫高榮將軍工作的——我在那兒組織着秘密反抗。」

我和我的愛國同志談了兩個多小時，別的旅客也都漸漸在廳堂的大靠背椅裏入睡了。在世界的另一端意想不到地遇見了確乎和我一樣遭受了亡國之恨的，自始就爲了完全和我同樣的目的而向我們敵人作反抗工作的一個法國人是非常令人感動的。雖然我們以前從未見過，現在證明我們對於戰爭的反響多麼相同，真是奇異呀——原因就在我們是從一個國土來的。

夜間兩點半時貝爾尼先生打斷了我們的談話，並且對我說：

「你得在六點鐘起來。在六點之前你必須休息休息，我有個主意。倘若你肯和我女人分睡一個牀，你可以睡到樓上我女人的屋子裏。」

這位英雄氣概的英國人居然把夫妻的牀榻一半讓給我。他到住在樓上的一個朋友的屋子裏設法給自己弄半個牀，現在我們必須上樓打擾貝爾尼夫人的清夢了。我們走進一間幾乎全被一個舊式的牀佔據了的屋子，牀上有位頭髮蒼白的太太入睡了。我們開了電燈時候，她的眼睛睜合着，一時睜

不開。她一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之後，立刻用最悅人的話來歡迎我。她沒有一點兒煩膩的樣子。她確實地說：「我高興你在這兒，」弄得我們哈哈大笑。被放逐的丈夫走去之後，我急忙在一個原始的馬桶間裏洗手完了。然後脫掉衣服，溜到溫暖的牀裏，把電燈熄了。在黑暗中貝爾尼夫人用哲學的口吻說：

「倘若我們再在大街上遇到時候，我真不知道我們還彼此認識不認識呢。」

我把貝爾尼夫人欣然允我闖入她的牀上，闖入她丈夫的地方這件事記憶起來作爲我全部旅程中所受招待最親切的表象之一，天亮時我準備走了，我第二次喚醒了她。一會兒我便在飛機場了，我們都冷得戰慄。昆明高出海面六千五百英尺，裂膚的寒風使我們越發認識這個拔海的高度了。我們等了長久的時間：最後我們起飛時已經八點了。

從那時以後，我什麼都不作，只是往下注視那對於每個西方人都是一種啓示的偉大的景象：中國的農民用他們堅忍的手一寸一寸造成的中國的土地。比章山和峽谷的天然形狀更動人的是散列山上和刻入谷間的成千的形狀不同的農田。每個斜坡都從頭至底精心闢成層層梯田，儼如一個藝術家隨着土壤的曲線設計了一個專爲飽人眼福的圖案。

我們從更高更荒的山上過去。褐色的或紅色的山脊不久便被一片純白的雲毯遮蓋起來，雲毯是

這樣平滑，我覺得我可以在上邊走。快降落時我們滑到雲層下面，我們又看見了耕種了的農田。這兒，在令人眩暈的高山之間是一條淡綠的河流——巨大的揚子江，成百的輕舢舨船，小汽艇，和好像肥大遲鈍的毛蟲似的有蓬的木船在揚子江的彼岸並排地碗泊着。飛機場是從淺水裏露出的一個灰色的沙島，只有水小時候纔能用。一羣穿着藍色長袍、西服，和制服的人仰着頭看我們飛機降落。

對於我，一切都是異常地外國情調的：和黑色的房子及迷漫的灰色天空相映的鮮明的藍色棉袍，微弱的或強烈的街道氣味——真的，這是全世界普遍的氣味，但是我從未領略像它彌漫到中國一個整個城市裏時的氣味——和重慶的一切噪聲：洋車夫小跑的步伐，夢幻的音樂和喻喻的歌聲，稀少的汽車的喇叭聲，和走街小販用以作為廣告的小鼓的聲音。

唯有被炸的房子帶着熱識的面孔。它們令我想起倫敦，蘭茲蓋特，考文特里，亞力山大，莫斯科，莫塞斯克——令我想起我在過去兩年裏見到的一串受傷的城市，但是在重慶判斷那些黑房子是敵人毀壞的和那些是因爲失修而毀壞的很不容易。因此，成堆的瓦礫比其他任何地方更爲難看。不單是戰爭要對這些瓦礫堆負責，和平也不足使這些瓦礫堆絕跡呢。

我們在返回加爾格答的途中，飛機在昆明停下。我從飛機跳出來，打聽陳納德司令部的道

路。當道格拉斯機正在添油，我們的飛行人員正在吃午飯時候，我要能和飛虎隊隊長得到個談話的機會真是有點兒幸運了。我突然聽見我的旅伴之一馬格魯得准將的聲音，他對我說：「你要見陳納德麼？他就在這兒。」我轉了身。馬格魯得把我介紹給陳納德，他是來機場上迎接我們飛機的。他有一副多麼不凡的面孔——多麼奇異的一副面孔呀！他臉部的線條特別清楚，他的頭髮和眼睛很黑。瘦的，線條粗重的兩頰和前額晒成了黃褐色，還有小小的斑點，好像是舊皮革造的。他的面孔簡直是一個海盜的面孔，一個幾百年前歐洲傭兵大隊長的面孔，或者是在天連水水連天的大海裏消磨了一生的的一個水手的面孔。然而不是。那個面孔，那個強健的身體是屬於一個醉心航空的美國人的，他有一個太太和八個兒女在故鄉魯西安納州瓦特魯甫城期待着……

他說：「在你的飛機起飛之前我們能談半點鐘。你來我的辦公室裏好麼？」從飛機場我能看見了幾架陳納德的P-40式驅逐機，機頭上繪着張大紅嘴露出嚇人的白牙的沙魚。我坐汽車到了一座低房子跟前，我被導入一間牆上釘滿地圖和圖表的屋子裏。

時間是短的：在幾分鐘之後我得回到道格拉斯機去。因此，談話有點倉促。不過，縱然我見了陳納德一剎那的空夫，也算值得了，那就使我永遠記住他。他的狂熱的精神不是用綺麗的字句和戲劇的表情表現出來的，我說話慢，用一種低而強的聲音說。他說話時他留心地聽：他的聲音實是

他的一個障礙。他幾乎一點不受感動——但是在他的黑亮的眼睛裏有充足的援救世界的意志和熱情。對他有魔力的東西就是他集中全力到他的任務上——到他需要的事物，到他計劃的事物上。他需要的是人員和物資的增援。他計劃的是攻擊日本。他大概是我們遇到日本的最有攻擊精神的敵人。

他好像一個體育教練員似地談他心愛的隊員，他總結最近幾星期裏飛虎們給予日寇的損害，他也坦白說到飛虎隊遭受的損失——他遇到的障礙和難於下嚥的各種的不幸。後來陳納德從椅子上急速站了起來，請我走到牆上掛着的一張東亞和太平洋地圖跟前，他用手把散在中國領土的可用的飛機場一個個給我指出來：

他說：「我們不可失掉時機，不可因緬甸慘敗而沮喪，我們必須準備從空中攻擊日本。我們有許多空軍根據地——這兒，那兒，還有那兒——從這些根據地我們能攻擊敵人過度擴大的區域裏遼長的供應線。例如，你看台灣：台灣現在是個主要的戰略中心，是日本的裝備西運或南運的中繼站。台灣能被攻破，但是只能從一個地方把它攻破：從中國內地。那麼我的觀點是這樣：我的人和我都記得中國的海岸和腹地。後來關於越南泰國和緬甸我們也知道了很多。倘若我們得到駕駛員和飛機的增援，倘若有一隊汽油供應充足的轟炸機隊加到我們的戰鬥機裏，我們能够立刻作些優良的攻擊工作。我們能對日本的戰爭機器給予破裂的打擊，我們能攻擊敵人的海上交通線，並能設法把

日本和它新佔的領土隔開。這是走向攻擊日本本土的第一步。必須從中心打擊日本帝國，沒有別的摧毀它的方法。」

「倘若我們得到增援……」這種話我聽過多少次了！許多次了。自從法國一戰以後，許多次了。但我從未聽過這樣激烈地說出來。我忽然想起在東方這是頭一次一個人用具體和實際的字句向我談論的不是防守而是攻擊。談論盟國的攻擊。當這位志願隊長重覆着說「我從這兒攻擊日本」或「我還能從那兒援救緬北」時候，傾聽他的話是個獨特的經驗——真彷彿他覺得單用他的力量和鐵的意志就能作這種事，彷彿他就要用他自己堅硬的拳頭打擊日本似的。

飛機要起飛了。我匆忙地和陳納德告別——和這個在此次戰爭中對中美合作貢獻最大的人告別了。他在珍珠港被襲前後的緊急時期堅決站在中國人方面。由於他和中國人一起戰鬥和他爲中國人戰鬥，他使中國人相信了美國的決心和勇氣。

在惡劣的氣候裏飛往臘戍途中，我從搖擺動盪的飛機上向中國的稻田和褐色的山巒看了最後的一眼。陳納德的低聲在我耳朵裏營營響着。我仍能聽見他說：

「我需要更多的驅逐機。我需要轟炸機。我需要航空人員。在華盛頓的他們知道麼？在美國的他們知道麼？告訴他們……」

加爾格答至德里裝有冷氣設備的火車早晨停在擠滿了人的阿·拉哈巴車站時候，尼赫魯沿着站台走來歡迎我，彷彿我們從前見過許多次似的。在幾分鐘之內他便叫人把我的行李搬進他的車裏。他開始問詢我到了中國的情形。在中國有許多許多崇敬他的人。

尼赫魯是個什麼樣子呢？像個童話裏的漂亮的王子，他是個貴族，也正像個貴族，他穿著優雅的印度服——一件裝鈕的白色外衣上佩着國民大會的紅綠徽章，緊小的白褲，頭上戴着甘地信徒的白色小帽。他柔弱而且有點兒矮。因為他的灰白的頭髮和局部的光禿，戴着甘地小帽比不戴時看去年青得多。只有他取下小帽時候我才想起他是五十二歲了。使人們不能忘掉他的不但是他黑得好看的眼睛和端正的容貌。還有，從他的很蒼白而且敏感的面孔上差不多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猜出他的心情：愉快的或憂鬱的。他的面孔是個雕奇的面孔；也是個多智的面孔。他的面孔變化很快，好似颯風天的天空。

阿南得布哈萬（Anand Bhawan）是尼赫魯從他當律師的父親莫提拉爾尼赫魯（Motilal Nehru）繼承下來的家宅的名字。他父親是當年最著名的印度人之一。他的家宅是個巨大的白色的別墅，每層房子都有幾十根圓柱支着通行的走廊；此外還有一個圓頂的高閣。花園是廣大的，燥熱的，長滿了美麗的花和老的欲睡的樹。

見尼赫魯是容易的，因為他十分真淳自然，又因為他喜歡人民，他歡迎滿家的親友的另一個原

因也許是他在德拉頓獄裏和勒克諾獄裏受了孤寂了。就在三個半月以前，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四日他才被釋放出來，這是他第八次坐獄了，這次期間是十四個月，尼赫魯的生命大約已有八年消磨在獄裏了。

尼赫魯要談到他從前坐獄時候，往往是最偶然的。不悲傷和不願受人可憐是他的性格中最令人佩服的一點。我們到了他的家後不久，他告訴我第二天要有七十個客人來參加他女兒印迪拉的結婚禮。新娘當然要像所有的國民大會會員一樣穿家作衣服的。尼赫魯說——沒有得意地說——他在獄裏也自己紡線，新娘穿的鑲着銀花邊的淡紅色結婚羅里（印度婦女穿的主要衣服，係一條長幅布，包圍腰部，一部份遮蓋胸部和頭部——譯者）就是用了他在獄裏紡的一些棉線織的。他高興地微笑着說：「你也許不信，但是在獄裏還了那些年，我確實紡得很好了。」

晚飯後，我和尼赫魯坐下打開關於印度的一個「鄭重的談話」。我們聚精會神地談，簡直把時間都忘了——至少我是這樣。我們沒有注意到所有他家的客人和他家裏的人對於我們滔滔不絕的談論都漸漸聽累了，溜出他的房子睡覺去了。

尼赫魯和他許多民族主義同志，特別是和甘地不同的思想上的根本趨向在於尼赫魯認為印度的獨立和世界一般的前進及世界政治的進化緊緊聯繫着。關於印度，英國最引以自豪的——英國不大

干涉印度地方的風俗和宗教，然而保持着連綿不斷的「法律與秩序」的統治這個事實——正是尼赫魯最不能忍受的。他不原諒英國在土耳其和俄國這些落後的國家向前做着可驚的躍進時候，把東方的時代之鐘給停住。他反對英國紳士的和平，他稱那種和平是「完美的墳墓和平」。他的反英鬥爭基本上是反對英國容忍印度自己的中世紀主義的鬥爭。

這是尼赫魯每次談到印度或戰爭時支配着他的思想的背景。當他和我說到「戰爭」時候，我們所指的不是一個東西。我——在過去七十五年裏被德國人侵略了三次的一個法國的公民，所說的戰爭是聯合國國家對野心侵略的國家德日及其與國的戰爭，而尼赫魯所說的戰爭是反對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思想的戰爭。因此，當英國——和我——鼓勵尼赫魯積極參加戰爭時候，他的乾脆的答覆就是他早在英法的前邊對法西斯主義戰鬥了。他提醒我當張伯倫的英國在張伯倫的綏靖政策時期昏昏欲睡時候，他已在大聲疾呼斥斥淹浸世界的極權狂流了。他會支持阿比西尼亞，共和政府的西班牙，中國，他還狂熱地反對過慕尼黑協定。他確實覺得爲印度的自由而戰是進行這次思想戰爭的另一方式。到了我們談話的要點時候，他說出這樣驚人的話：「這個戰爭是我們的戰爭。但是你不明白：在這個戰爭裏，英國是站在另一方面的。」

尼赫魯要遵守他宣佈的原則，但是現在他面對着緊迫的現實：日軍向印度邊界迅速的推進。關於這個他正作何打算呢？我的印象是——實際上他不知道這時候他該怎麼辦，他感覺他控制不住的

可憐的事件從他旁邊發展到他前面去了。尼赫魯絲毫不是個綏靖主義者或者是個妥協者，但是他沒有把失望，把一種玄妙的失敗主義排除淨盡。當我問他甚而民族主義領袖們究竟有無力量動搖印度對於戰爭很深的漠不關心的態度時候，他坦白地，黯然地說：「我不知道。我們試著作。」——他的語氣令我寒慄。後來在晚上他突然對我說：「現在，一切都導向災難。」

他的觀點是英國的威望降得太低了，攻擊印度的實際的危險太大了。他不時重覆着：「除非用一個獨立宣言把這個情緒改變過來，否則我們不能喚起我們的人民反抗侵略者。」但是他指出——而且這是重要的——英國人把政權實際移交印度人時需要「調整」。雖然他沒有明顯地這樣說，我覺得他基本上是不敵視一個過渡時期的，倘若「完全獨立」立時成了一個確定的話。當我問「你對於自治領地位這個名詞有何反響呢」的時候，他現出最有趣的微笑說：「那令我有些兒眩暈。」

但是有一個方面尼赫魯對於事實表示了很實際的認識，而且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就是在日本侵略時保護印度人民。他主張發展印度鄉村家庭工業使每個區域縱然在交通破壞時能在衣服和主要貨品方面自給。當然，區域食物自給是同樣重要的。他預料在驚，慌，空襲，「不良份子」乘機作惡時候也許發生混亂。他認為三百來家可以組成團體照顧自己，警衛自己的地區。他主要的憂慮是怎樣使鄉民不害怕，不挨餓。鼓舞他們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堅強團結一起，曾經宣佈印度國民大會這次戰爭中是「非交戰者」的尼赫魯十分明瞭保護國家的精神終於能被鼓舞起來的精神條件和物

質條件。但是這可給了他咀咒英國及其對印度的政策。他說倘若爲了英國的市場，沒有使印度在工業上自給而在戰時發覺了印度的脆弱，那就是英國人的錯誤。

尼赫魯很同情中國。他知道中國的物質條件和印度物質條件相似，他相信在目前緊急的情況下印度大可學習千百萬中國人——也是沒有武裝而根本愛好和平的人民——曾經有效地抵抗他們的敵人，並在過去四年多改造了他們西部各省所用過的方式。

我離開了阿拉哈巴和擺滯了禮物的尼赫魯的家。在空悶的拖我到德里的發熱的火車裏，我衣服上堆積着一層一層的塵土，我由不得想尼赫魯——想這個偉大的人物，他是個十分優雅，質樸，可愛的人。我依然能看見他穿着他的單色的潔淨的印度服在他的房子附近動作迅速的樣子。他時常赤腳：所以人們聽不見他走路。我突然看見了一個向陽的走廊上他前邊的身影，並且聽見他一陣年青的令人同感的大笑聲音。誰肯把像尼赫魯這樣性格優美的人投進獄裏把他關在獄裏呢？誰是忍心給他關上了門把門給他鎖上的獄吏呢？我決不忍心轉動那個鑰匙把門鎖上。誰也不能把像尼赫魯的人民鎖起來。他們生來是自由的。

我現在看見了印度的一點兒，我看見了尼赫魯——印度眷戀的一個人，他與破爛傾圮的印度是

個何等奇異的對照呀！印度頂多是在十世紀裏活着，他却在二十世紀裏活着。印度是在亞洲的心裏——他却試着用西方的思想，西方的方式解決印度的問題。有時他的努力似乎完全是不合現實的，他的理論似乎是完全沒有希望的。他和印度這個巨大的不幸與神祕的大山之間的鴻溝似乎太寬了。但是也許只有像尼赫魯這樣勇敢的個人纔能使印度完全改變。從地中海岸到遠東一帶感覺「獨立」和「民主」兩字的意義相同的民族主義領袖是非常稀少的。那些高聲喊叫「自由」和試着把他們自己的國家和西方統治脫離的愛國者實際上大多在渴求比白種人更甚的統治他們自己人民的專制自由。至於尼赫魯就不同了。他確實是個足能使印度的反動的支持者不安，使英美大工商極沮喪的民主主義者。他一有了機會，他就要用他的全力把他的國家推向前進。他要努力使印度追上二十世紀。也許一百年或二百年，也許僅僅很短的時期他把這個沉重的大山移動成功了。

我在阿拉哈巴離開尼赫魯之後三天，在新德里和另一位社會主義者談了一次話，那就是克里浦斯。三月二十六日星期四的早晨，英國掌璽大臣克里浦斯在祕書廳的房子裏舉行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他解釋他的使命：「我以英國戰時內閣一個閣員的資格來把英國政府商妥的計劃帶到印度領袖們的面前。」

我和克里浦斯作了一次感悟啓發的談話，這次談話解答了我默思幾個月的一些問題之中的幾個問題。在我的旅途裏我經過了英帝國的一個大的部份。在英國有重大利益的緬甸，印度，和伊拉

克，伊朗及埃及之類的「獨立」國家裏，我曉得盟國陣線的某些弱點——近來已具體化爲重大的失敗了——除軍事原因之外，還有其政治的和社會的原因。我會見到紛擾的不滿的人民。在東方住了多年，對於戰時英倫三島情形生疏的英國公務員身上，我沒有看見被閃擊的倫敦那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在這兒的機關裏和英國人裏都存在着英帝國停滯的元素。

但是現在直接從倫敦來了印度人很少遇見的一位特殊的英國人：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敢有意見——甚而是敢有幻想的政治領袖。英國的尼赫魯來這兒見印度的尼赫魯。英國的生存鬥爭使他更接近現實更堅強了的英國的尼赫魯——克里浦斯，他不但在英國看見了作戰，而且在他當大使的蘇聯也看見了作戰。英國和俄國都使他相信軍事勝利不只在戰場上爭取，還須在作戰的國家之內，在它的人民的靈魂裏爭取。

我向來不濫用「民主」這個字，但是有一次我由不得在我的日記裏寫着：「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六日，遇見了一位真正民主的英國人。」克里浦斯這次來到印度確實不但有幫助印度人決定他們命運的野心，而且有幫助英國人決定英國人命運的野心。他不但想使印度相信而且想使全世界相信英國確在爲自由而戰，他是勇敢的新英國的使者。

在祕書廳辦公室裏——我常常去參加克里浦斯記者招待會的屋子，檢查我發出的電訊或會見預先

熱定的那兒工作的文官的屋子——我得到怎樣統治印度的一個粗糲的觀念。使我最驚異的是我在走廊裏遇見的深褐色的人的數目之多和我看見在辦公室門上貼着的印度人的名字數目，當我弄明白時候，我才知道了我愚蠢得多麼利害，我簡直昏了——英國用一千一百八十五名文官統治着印度，其中印度人五百九十七名，英國人只五百八十八名。一共五百八十八個英國人要統治一個千百萬人民的國家！管理紐約的瓦多爾夫阿斯托里亞還需那個數目的三倍的人員呢。——除此而外，當然還要加上軍隊：平時最多是英軍六萬，還有英國人當軍官的印度人的軍隊十五萬。在上著各邦裏，手續越發簡單：一張紙——當地的印度王公和英帝國政府相互同意英國「至上」而後成立的一個條約。

一夜的工夫新得里變成了一個新聞的主要中心。人們從印度的各角落和世界的各角落匆忙來到這個首都，在帝國飯店或薩伏亞飯店裏找個任何一種安身地方都幾乎成了一件不可能的大事。運輸也是困難的，營業汽車稀少，馬車走到這個紅色沙石的官廳建築物需要很多的時間，我住在總司令宅子的一間寬大舒適的屋子裏真覺得是個很享特權的人了。在加爾格答時魏非爾將軍對我說：「倘若你到了新得里，你可以和我們住在一起呀。」我把他的邀請當作天降的禮物歡欣地接受下來。

我真高興與我恰巧追隨上了克里浦斯談判，我不是從政治第一的房子裏追隨上的，而是從政治第一末的房子裏追隨上的——從魏非爾的房子裏追隨上的。這種情況令我立刻想到現在對於爭取戰爭勝

利關係最大的是什麼。無論在英國或在印度，政治不是魏菲爾的事情，關於政治，他談到一個字的時候都很少。

魏菲爾總司令在新德里時候，一天裏大部份時間見不到他，但是這天突然在吃飯時候他在客廳裏出現了，客廳裏有魏菲爾夫人，他的兩個女兒，參謀總長哈特萊將軍和哈特萊夫人，他的副官和一兩個偶然的客人在等待他，午飯時他穿着茶褐色布短褲和反領襯衫。他像個英國的紳士似地吃飯時候整整齊齊穿着時髦的海軍藍制服，乍然看去，他的樣子十分年青。他長着一頭好看的銀髮，堅強的丈夫的英姿，和一副大多時間生活在戶外的人的健康的面容，因為他的半閉的沒有表情的左眼（一九一四年大戰時受傷的），初看，他的臉表露不出什麼來。但是在他的臉裏有力量，有回憶，有和善——有神祕：一個感覺自己的心力和體力的健壯足能担負自己責任的重量而且不需別人替他發愁的人的神祕。

我發覺我不是個英國人也不是個印度人而是個法國人這個事實對於我在新得里的工作是個真正的福佑。這給了我完全的活動自由和以平等友誼精神會見他們的機會。例如，一天晚上——三月二十七日期五——我做了一件空前的事情：我拿起電話機來，我從總司令的宅子叫甘地住着的比爾拉大廈的電話。這似乎是住在魏菲爾家想見甘地的任何人都要採取的一個十分自然的步驟。然而只這小小的舉動就動搖了新德里議定書嚴峻的條款，總司令的漂亮愉快的副官科次上尉鄭重地對我

說：「這是一次具有歷史性的電話。」

● 不管歷史性不歷史性，這次電話給了我很深的印象。我叫電話找這位七十二歲的甘地，我自己就覺得不自然，甘地——這位在印度最有勢力的印度人，在新得里的每個新聞記者都狂熱地設法要見的人。我用有點顫抖的聲音把我的名字告給了接電話的祕書。我說我有一封尼赫魯把我介紹給甘地先生的信——那麼我可以在隨便那一天那個時間見甘地先生麼？那邊祕書說：「請你等一等」，我等著——等了似乎是個無盡的時期。後來祕書回來了，他問：

「你能走路麼？」

我覺得這話似乎離題了。但是我的答覆是肯定的。毫無問題我能走路。事實上我走了多少年的路了。

「好罷，」祕書說，「甘地先生每天早晨七點鐘散步，明天就在這個時間同你一起散步。」

我喜歡極了。我和甘地的會見終於實現了！我從我打電話的辦公室回到露台上加入了宴會的客人裏。我不願意把我新聞記者的工作告訴給魏菲爾將軍來消費他的時間。他呢，因為具有英國人的真誠尊重個人自由的習慣，所以從不問我會見印度國民大會黨員，會見那些極力要打破他自己所象徵的英國條律的人們的情形。魏菲爾夫人和他自己誠懇地向我打開他們的房門是因為瞭解我是個做了許多工作的人——魏菲爾甚而從未問過我對於印度獨立問題的意見，但是那天夜裏我太興奮了，

我簡直守不住自己的祕密了，我得意地對總司令說：

「明天早晨七點鐘我要見甘地去。」

魏菲爾的單眼表現出一種強烈的興趣，喜悅，和一種微妙的嫉妒，同時小聲喃喃地說：

「我喜歡見甘地！」

他彷彿說了個笑話——他說的正是心裏的意思，而且事實上在這個英印談判時候能够舉行的最有益的意見交換恐怕就是印度武裝部隊的總司令和印度「非暴力」羣衆的和平主義領袖的意見交換了，這也許能使甘地出來擔當印度目前的危險。然而英國人和「有政治頭腦的印度人」的關係是這樣：除去官方佈置的會見之外，一個英國的將軍不能坐上他的汽車開到比爾拉大廈不拘形式地隨便去見甘地喝杯茶或者私談一番。就是因爲「未能這樣作」，所以惹出了各方面無盡的批評。除去印度總督和克里浦斯而外，我在新德里見到的英國人（而且他們不像魏菲爾，却是在印度住了多年了）沒有一個會會過甘地或尼赫魯的。會過回教徒真納的英國人也很少。英國的皇子也大多從未會過而且也從未願意會見印度國民大會黨員。在整個克里浦斯談判期間，國民大會領袖們甚而一次都沒有會見回教同盟的領袖們。全印度在玩捉迷藏戲。

星期六早晨（三月二十八日），我在五點半鐘醒來，準備妥當去會見甘地。科次上尉爲我預備

了一輛汽車，在六點三刻時接我來了。我看看華耀的汽車，我看看戴着頭巾的印度司機的制服，我便開始不安地盤算着「該怎樣和不該怎樣」了。真的，我不想該坐着一輛英國的官家汽車到國民大會工作委員會去。那樣能引起逆意的結果——也許一切都弄糟了。國民大會黨員也有他們的議定書，他們的禁令，所以我到從很遠可以看到甘地住所的地方下了汽車，徒步走了幾百碼到了大門跟前：在這樣早的時間便有一羣質樸的印度平民敬重地聚在甘地住所的前邊，好似聚在神龕前邊一樣。

受着一副勤苦的律師面孔的一個甘地的祕書比雅萊拉爾先生在這座外觀闊氣的宅子的門廳裏歡迎我，這座宅子是最富的國民大會的支持者比爾拉先生的，我差不多立刻被引到一間窗戶向着花園的明亮的屋子裏。裏邊唯一的陳設是全用白單子蓋着的寬厚的蒲團，上邊坐着一個世界上最有勢力而身體微弱的人，他的裸着的褐色瘦腿交叉在他的面前。甘地先生甚而比我想像的還瘦小。看去他好像個很珍奇的淡黑色小動物——像個用針釘在坐墊上的昆蟲。他有個小的三角形的頭，幾乎都光禿了，配着兩隻顯著的大的耳朵，一個大的鼻子，一縷沒有把上唇完全遮住的短鬚，和一張很厚的下唇。他的富於表情的靈動的嘴慢慢地用他著名的「輕柔而藏着鋼」（尼赫魯寫道）的聲音吐出清晰的英國字。因為甘地的神祕的舉止，所以能夠給人極深的印象。他使我感覺到他能看穿我，他立刻使我羞怯起來。但是他一點兒也不嚴峻。他帶着金屬鑲邊的舊式眼鏡，他的聰明的眼睛顯出友好和談諧。他的微笑裏也藏着和善——與一種奇異的幽默感。甘地差不多有比我們見到的一切人更大

的魔力。

我們並非立刻就實行我們的約定的「散步」，原因是甘地必須先吃他的切開的蜜柑和芒果的早點。一個穿着印度服的女子坐在他的腳前的地板上，這個女子的名字我不大清楚，但是我相信是他的信徒納奧羅吉小姐（Miss Krishna Kuroji）。在甘地的另一邊坐着比雅萊拉爾先生，他拿着一支自來水筆和一本大雜記簿。他準備錄下我們這個兩小時談話中甘地先生所說的和我所說的話。這後來證明對於我是十分有用的。在談話時候我不敢記錄，但是快到中午我回來時候，我照着比雅萊拉爾先生的雜記簿一字一字地抄下甘地先生最重要的話，這樣便可以正確地引用了。

我坐在白蒲團附近的地板上時候，我想起了我母親居里瑪麗對於甘地的尊崇，我想起她多麼直覺地相信甘地反回更簡單的生活方式的主張，他認為更簡單的生活方式並不和現代科學的進步矛盾，她像甘地似地「贊成鄉村，反對城市。」甘地爲了印度獨立而進行的長期鬥爭中和隨時隨地——先在南非後在印度反對不平的長期鬥爭中表現的堅忍和偉大一向令我欽佩，他對於世界的精神的進步作了很大的貢獻——所以我實在的尊重他，但是今天，我預先就知道有一個問題——戰爭——我是不同意甘地的，我向這位倔強的和平主義者提出歐洲被佔領各國一般公民的觀點，提出深信若輔心勝利波蘭和法國可怕的命運要落到印度身上的一個公民的觀點，我真想帶着幾分愚蠢地告訴甘地

說：「爲了印度——同你的人民一起參加戰爭罷。」他對於我的議論提出了不變的箴言：「我反對一切戰爭，反對使用武力。我信仰非暴力。我想印度憑恃它的非暴力，將成爲全世界的和平使者。」

就某種意義講，「和平主義者」這個字用到甘地身上完全錯了。坐在我面前白蒲團上的這個瘦小的人實際是個戰士，他發明了一種新武器，於是立刻把從前使用的武器都看作是不好的，把那些武器都擯棄了。

毫無疑問，甘地沒有兵器，赤手空拳反抗英帝國的「全部力量」，有了驚人的成就。然而今天迫於眉睫的印度的危險不是來自英國而是來自日本。

「你要發覺用非暴力反對日本或德國的軍隊是比暗傷英國的統治更困難的。」

他點頭表示同意，但是立刻說：

「然而這是一樣的鬥爭。」他添說：「那種鬥爭將是艱苦的，然而這是我們實行我們信仰的時候：我們在爲後代兒孫工作。假如日本侵略印度，我不鼓勵我的人們用武裝戰鬥，我也不勸他們和侵略者訂公約。我要告訴民衆：不要打——你們的靈魂也不要屈服，倘若日本接着英國統治起印度來，那麼我們也用非暴力向日本的統治鬥爭。」

我堅持着：「這種鬥爭將是越發困難的。」

甘地傲然地抬起他的下巴，用安靜的聲調說：

「那要產生我們所希望的最好的結果。」

「但是你單用非暴力怎能希望對這樣殘酷的敵人爭得勝利呢？」我繼續說。你難道看不見你反英鬥爭的良好機會是因爲英國沒用暴力對付你麼？你鬥爭了二十年之後，你還在這兒，健康也好，能作出驚人的努力，自由的發行一種報紙，許可你的書在印度各地出售。你還活在英國統治的印度國土上。你想日本人許可愛國志士活麼？」

甘地回答：「在非暴力鬥爭中只有兩個選擇，或者敵人向你好——那麼你就不流血而獲得勝利了——或者敵人把你消滅。這個最後的解決並一點兒不比一個戰爭所產生的結果壞。」

我搜集起我們所有的一切西方的現實主義理論和甘地討論武裝抵抗侵略的問題——但是我沒有達到目的。我覺得他和我彷彿在一座樓房的不同的兩層上走，他在最上一層，我在最下一層。我們永見不着面。這兒沒有使我能够找到他的樓梯。我也從未得着在走廊裏和他面遇的機會對他說：「喂！我終究找着你了。」誰也「找不着」甘地先生：他總是溜開的。

我怎能希望對甘地先生爭辯獲勝呢？他是個聖人——我不是個聖人。他又是個政治家——我不是個政治家。他的神秘的信念，加上他的律師的聰明，一定能戰敗我。最後說到一件要緊的事情——甘地先生大大勝過我了：在三月二十八日這個星期六的早晨，他已經知道了英國對印度的建

議，可是我還不知道。說來說去這是我們談話的真正實際的背景。當甘地用宏大動人的雄辯再肯定成了他多年信條的反對一切戰爭的信條時候，這位政治家對於克里浦斯計劃已經有了決定；他不同意這個計劃。他決定了國民大會工作委員會應該拒絕這個計劃，雖然初步會談差點兒沒有開成，但英印談判在骨子裏已經失敗了——因為這位七十二歲的甘地已經選擇了應該採取的決定。

我們談到克里浦斯的使命時候，我差不多感覺到這個，我告訴甘地說我欽佩克里浦斯設法一面不削弱聯合國的立場一面解決印度自治的真誠。克里浦斯是很願意印度自治的。甘地的批評是：

「克里浦斯先生是個很好的人。但是他進入了一個壞的體系裏：英帝國的機器。他以爲他要改善這部機器。結果是這部機器反而把他最大的優點都用去了。」

然後他作了一個談話的抑制不住的微笑。

現在已經八點一刻：甘地散步的時候了。甘地站起來，離開他的白蒲團又整理了遮着他半個瘦身子的寬鬆的粗布，拿起他的長手杖，走向花園去。他在比爾拉先生的保修完好的花園小徑上敏捷地步調勻整地走，他不時靠到他的女信徒的肩上。但是實際上他是不需別人扶持的。他是個健康的老人。

我們是個奇異的行列，甘地和納奧羅吉小姐在前邊——他是半裸體的，她穿着一件棉織薩里

——我穿着一件白山東綢的衣服在他們旁邊快樂地走，比雅萊拉爾先生在我後邊，還有一兩個不知道從那兒來的穿著粗布的褐色皮膚的印度同伴。在早晨的陽光裏，在增長着的熱度裏，我們關於戰爭的討論仍然熱烈地進行着。我對這位走過了一個漫長的人生歷程找到了他自己的真理的哲學家，對這位利用非暴力方式爭取印度獨立多年的戰士和政治領袖坦率地作出執劍姿態並且向他建議用武力幫助反抗極權的侵略。

但是這位不可征服的甘地先生的傲然的答覆是：

「我不需要一把劍。我將不用武器而得到勝利。」

這時比雅萊拉爾先生問我在那兒住。我說：「在總司令家裏。」甘地先生聽了似乎驚異。他有點兒嚴肅地問道：

「你是怎樣作了魏菲爾將軍的客人的呢？」

我把我作魏菲爾將軍客人的經過告訴了他。我想甘地總不大滿意，但是這個發現並未使他減少對我的友好。我請求他許可我發表我對他的訪問記。他說：

「唉呀，那你不是要寫你來到這兒和一個愚蠢的老頭子談過的話麼？」

我回答說我要遵從他的意願。倘若他不願意我寫篇東西現在發表，那我就什麼也不寫，只要見上他，我就覺得很榮幸了。我也可以寫個甘地先生訪問記的草稿讓他看過。倘若他不喜歡這個草

稿，我就把它撕了。這個辦法對於甘地似乎合意。

中午我回來——第二天早晨把我寫的東西送給他看。他一個字沒有改。我相信在那種危機的日子裏這是他唯一許可發表的一字未改的一篇訪問記。我沒有再見甘地，但是我又在比爾拉大廈裏隨意消磨了幾小時和國民大會各領袖談話。

我不只一次脫掉我的鞋進入甘地的赤腳的工作同志們坐在低凳子上吃中飯的餐室裏。他們用手指頭吃他們不適用於這種簡單技術的食品，因為各種菜蔬浸在液體調味品裏。電話不絕地響。同時在這座奢華的大廈每個角落裏身上罩着白粗布的印度政治家之間進行着興奮的討論。

黃昏時候，政治的煽動沉靜下去，一種宗教的狂熱出現了。新聞記者走了，光亮的汽車一個個離去了。然後站在門外的微賤的人們一聲不響地進入花園裏。七點鐘響了時候，不管有危機或者沒有危機，有克里浦斯或者沒有克里浦斯，甘地開始在坐於地上罨罨的大地毯上的人羣面前作他的禱告了。夜慢慢地落到牧羊人和他的羊羣上。

返回美國

這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四日，五個月以前，在十一月裏我離開了未參戰的美國。現在我要沿着我走過一次的路經由近東和非洲返回紐約了。在這五個月裏，一個加入戰爭的美國甚而比我走得還快：從地理上說，它已經追上我了。當英國航空公司水上飛機在「印度某地」降落下來讓我們作第一夜的歇宿時候，當地的美國領事立刻問我們：「你們今天晚上願意參加一個游藝會麼？這是英美軍隊合辦的一個游藝會，我們都要去參加的。」他添說：「你們不知道麼？這個城市已經到處是美國兵了。這兒已經有好幾千。還有許多要來呢。」

我們到了游藝會。台上英國兵正說倫敦方言的笑話，美國步兵唱，拉小四弦琴，嘻嘻哈哈，盡情玩樂。他們好像走遍天下沒有人管的勇敢的、精神飽滿的孩子。但是在我看着這些人時候，我突然兩眼淚汪汪地。就是因為這些美國人穿着美軍制服，唱着愉快的腔調，使我想起了在一九一七年，我在爲了生存而鬥爭流血已有三年之久的法國的兒時的日子——想起了一個巨大的關於希望的消息傳遍了我的受創的國家的日子，從最小的鄉村到泥濘的戰壕：「美國軍隊來到了！」那意味着我們要戰勝了。

一切一切都歷歷在目：共同的痛苦和共同的勝利，潘興和福煦，法國的，美國的，和英國的國旗在風裏招展，……：「直到戰爭成爲過去在歐洲成爲過去」的歌子……：和破滅了的幻想，在一九一八年，戰爭沒有「過去，沒有在歐洲過去」——甚而在一九四二年的今天都沒有成爲過去。但是現在又有了這種呼聲：「美國軍隊來了！」雖然我在離巴黎四千五百英里的「印度某地」傾聽這種呼聲，雖然法國已經崩潰了，這幾個字仍然意味着同樣的東西：德國還要被打倒，法國不能滅亡。

我們在喀什穆降落時候，我幾乎認識不出飛機場來。在燥熱的沙漠這塊地方有個介乎拉瓜地亞飛機場和美國夏令營之間的東西——機場。往印度，阿比西尼亞，或大西洋岸的旅客都在這兒宿夜而且吃一頓在加里福尼亞或支加哥罐頭裝置的地道的美國飯。我們站成一行讓穿着神氣的制服的汎美航空公司職員檢驗我們的飛機票，他們高聲喊着「請這邊走！……請這邊走……！」——彷彿我們是無線電城裏等待看電影的鄉下旅客。

從我冬季到過這兒以後一切都變了。因爲美國已經加入戰爭，現在我能在蘇丹得到一些米爾窩基啤酒，在一個遼遠的尼日里亞飛機場能吃到一個美國的飯店裏堪稱上品的油煎雞，汎美航空公司和美國陸軍堅決不採用熱帶食品和非洲習慣。並非美國人嫌惡「外國菜」，而是美國人想要一

一切都像在家裏一樣——像在依阿華，內布拉斯加，或魯西安納一樣，像在布魯克林或舊金山一樣……

富有活力的美國人，耐心的英國人拓殖非洲開化非洲有許多年了。現在美國人來了，非洲（非洲的別名）動盪起來。非洲來了一根「美國的腰帶」：從黃金海岸一直到埃及，美國人在各地修築飛機跑道，構架房屋，鑿井，清除叢林，架設無線電台和高射砲，努力消滅蚊蟲，哼着百老匯的歌子。好個奇異的運輸呀！我們同機的一位乘客雷諾茲（汎美航空公司的特里普的助手）突然發現他的行李沒有留心遺在喀吐穆了。但是我們到了尼日里亞時候，下一班的道格拉斯機已搭載着他的小皮囊趕上我們了——就彷彿麥阿密城與大西洋城之間一道美國航線那麼短。

美國飛機也改變了許多。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美國還沒有加入戰爭——我看見汎美航空公司在非洲用的運輸機是異常舒適而且沉重的，機身裏鋪着地毯，厚墊的座位，簾幔，烟碟，食品，飲料，還有給量機的人用的紙袋。但是現在——五個月之後——什麼都取消了，正像俄國的和英國的飛機一樣——飛得更快，節省載重。我坐在一個金屬凳子上，脊背對着窗戶，一根帆布帶束在我的腰間防止我在光滑的座上滑動。沒有墊子，沒有大的簾幔，我的頭沒有休息的地方——沒有紙袋。

固然我先前飛過這條航線，我是這條航線的「老主顧」，可以引以自豪，但是我的經驗對於同

機的大多數人並不算稀奇，除了雷諾茲，圖爾民（一個在沙漠裏爲自由法國戰士開救護車的勇敢的美國女子）和我而外，其餘的同機乘客差不多都是在這條航線上已經往返幾十次的飛機駕駛員，現在他們覺得這個乏味的橫越非洲的飛行就彷彿坐了一次公共汽車似的，他們甚而不往窗外看；他們讀偵探小說。

現在關於美國，我必須重新學習了，我必須把我在報紙的每欄或每條新聞裏印着的「聯合國」這個字眼兒和我在十二萬里旅行之後我腦子裏所印的粗糙沒有修飾的照片互相吻合起來。我費了很大力氣，我不能——現在不能——承認「聯合」這個字的真義和事實相符，我所看到的是不同的人——種族，膚色，宗教，政體，生活水準，財富，和文明形式都不同——在並肩而非「一塊兒」對同一的敵人進行同一的全球戰爭。英帝國，美國的民主，訓政時期的中國政府，共產主義的俄國，和它們的盟國，在達到沒有嫉妒沒有互相猜疑的真正合作真正瞭解之前還須走很長很長的路程呢。

現在我可以回顧我在戰士中的旅行了——在這次特殊的旅行之前已經開始的旅行，而且要接着這次特殊的旅行繼續下去，我的旅行開始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一日星期一那天夜裏——在納粹進

入巴黎之前我離開了我的家，從那以後，整個戰爭戲劇便在我的面前，我的周圍展開了。我曾是被敵人逼迫到法國公路上的千百萬難民中的一個難民。那時的法國是被自己的失敗弄得目瞪口呆的法國，是已經被陰險的出賣法國的人們誘迷了的法國。在倫敦，在德國的炸彈震撼着古老可珍的房舍時候，在白燄黑烟向天空猛升的時候，我看見了英國鎮定自若，而且一夜的工夫產生了共同的英勇行爲，就在那時候，在那兒，聯合國的第一個核心由邱吉爾，薛戈爾斯基，威廉明娜皇后，戴高樂，貝奈斯這些人們和自治領的人們給造成了，由一切不讓希特勒勝利的神智清醒未備武器的英雄給造成了。

在這次旅行裏，我看見了同樣的聯合——在各戰場上艱苦地向着一個決不使我們許多人失望的勝利推進的非常擴大的聯合，在利比亞，俄國，緬甸，和中國，我遇到了各種國籍的士兵——也許昨天是自私自利的人——今天已經準備在從敵人手裏爭取五十碼的泥或沙的時候讓他的肉被砲彈炸裂或者在一輛被燃燒的坦克車裏燒死，我甚而看見了，像俄國人和波蘭人這種從前彼此憎恨的人，爲了一塊兒打擊他們的共同敵人而消除了舊怨。

那麼爲什麼迅速的飛剪號載我離開了戰場時候我第一次感覺到充滿了焦慮和恐懼的日子呢？爲什麼呢？我想這些士兵一向是不至叫我焦慮的。我是看見了付託給我們這些沒有作戰沒有冒生命危險的——聯合國裏千百萬平民的工作的艱鉅。我們受士兵的槍砲的保護，受他們的生命保護，我

們會拿出士兵勇氣進行我們自己的戰爭麼？國內戰線上的奮鬥不只包括在工廠裏鑄造武器或在農場上生產食物，或者婦女登記參加非戰鬥職務這些偉大的工作。不只包括購買公債，遵守定量分配，不坐汽車玩樂，織造汗衫和捲綳帶。

輿論進行戰爭。政治家外交家政府官吏進行戰爭。在戰爭場上打勝仗殺千百萬人不是擊敗軸心的。我們還須殺滅不禮國界並且像傳染病似地蔓延着的觀念。各聯合國家是在各自的領土之內以攻擊納粹軍隊時候鼓舞士兵的那種決心打擊納粹主義及其變形的恐怖屈從麼？我們自己的民主覺醒的熱情誠實和勇敢甚而足夠最後勸服我們的失敗的敵人相信我們能用某種確實更好的事物確實行得通的事物——不是用放任主義世界中的一種政治的真空——來代替極權主義麼？現在正當我們還有時間鞏固在物質上堅強，在政治上脆弱的我們的聯合時候——當並肩作戰的緊急的必需使盟國不至分離時候，我們是在鞏固這種聯合麼？我們是在建立甚而可以部份地滿足十五億人對於自由安全和麵包的渴望的一個凝合而且可行的新世界計劃麼？

我依然解脫不了一個簡單的重要的信念：我們在獲得戰爭勝利，但是在軍事分野之外，我們偉大的聯合沒有確實發揮作用。我很想把幾個中國朋友領到我認識的英國，或者拉幾個我想得起來的美國人到俄國的雪裏（反過來說，拉幾個俄國人到美國來），這樣過了一會他們自己就要說：「這兒

有個偉大的人民！——我這次旅行的主要的獲益是這次旅行使我瞭解到中美英俄四大盟國之間的基本的差異——瞭解到只有清清楚楚知道了這些差異纔能最後產生這不可征服的各個國家的有效合作。

將來如何，不能預料，但是現在我們已經看到和平來到時候，和平也正如聯合國戰時的同盟是個很不完美的同盟似地一定是永久不能齊一的強銳勢力之間的妥協。戰爭又一次教訓我們——愛國心是地球上最大的推動力，甚而爲了得到最遙遠的成功機會，由現在的聯合產生一個世界組織——如全球警察或經濟合作機構——許多加重的愛國心一同爲各國的利益而努力，而不可設法把愛國心完全破壞或予以挫折，因爲這不久就要證明是徒然的。現在民主國家應該明瞭唯一能使人們甘心犧牲性命的強烈的愛國情緒不能在戰時狂妄地予以助長，而要在和平一來到時候把它擱置起來，甚而伴作完全把它擯棄的樣子。今天甘心爲波蘭而死的一個波蘭人倘若倖免於死，他也願意爲波蘭而活。這個戰爭正教訓他波蘭不能孤立生存的堅苦的課程，教訓他被恐怖給弄得四分五裂，盲目，怠惰，糜痺的一九三〇年代的混亂的歐洲不能再出現。

我在各戰場沒有見到一個人——一個人都沒有見到——願意再返回過去的狀態。戰爭固然可怕，戰爭的特質就是如此：這個拚命的鬥爭正產生着比在粗忽的「正常生活」裏產生的靈魂更清澈，肉體更堅實的一代新人——正在戰爭烽火之外發現着希望的人們。現在他們懂得了一個國家不能再規避平時的責任就如不能規避戰時的戰鬥一樣，他們懂得了財富的關係很小，渴求的關係很大，他

們懂得了自由是值得拿最大的犧牲去爭取的東西。是的，畸形的過去已經告終了，因為許許多多的人今天正爲他們一度選舉過的政治家的錯誤而流血。英國人一定不再要張伯倫的英國，法國人也一定不再要在德軍面前毀毀的生靈的法國了。似乎拿戰前若干成就引以自豪的俄國人和中國人認爲他們才將開始建設他們巨大的國家——印度人覺得他們甚而還沒有開始。真也奇怪，在所有和我談過話的士兵之中，只有美國的士兵說「我想返回我從前的狀態」——但是他相信美國永不能再產生政治的孤立了。他們願意返回從前狀態也許因爲和其他強國的人民比較起來他們的戰前生活是個很好的生活。

現在我們面前就擺着這個事實：雖然軍事的戰鬥要停止，砲要不發射，但是爲世界合作而進行的戰鬥要延續到比我們一生還長的時間。在那個戰爭裏也許永遠沒有一個完全勝利，而且我們首先顧慮的是在那個戰爭裏不該有個破滅的失敗。我們從一切盟國的形式不同的共同需要——不受侵略的安全來審慎適度地着手。這是個公分母，是個堅固的基礎。從這兒，聯合國就能耐心地先在各聯合國之間最後與稍爲改革了的敵人打開走向其他合作形式的道路。聯合國實踐這個艱鉅的任務需要何等的毅力，何等的想像力，何等的對自己的嚴厲——還需要何等的謙讓！……

現在我們的飛剪號在大西洋上向着落日飛着。我們下邊又是一個戰場，對於在利比亞，俄國，甚而中國一切戰鬥的最終結果關係至大的一個戰場：大西洋，看不見的德國潛艇騷擾着的大西洋。

我們下邊也是一道宏大的海峽，目前它表示着世界一個最重要的界線：它把完整的沒有受傷的美洲和一切在自己國土上自己血肉遭受不可言狀的戰爭的殘酷的國家分開。在它的東面是歐亞非三洲這些大塊的領土，那兒發生了無法挽回的事情：對倫敦，亞力山大，華沙，莫斯科，和重慶殘忍的轟炸，在法國人質的槍殺，波蘭和捷克斯拉夫的屠戮，在南京和香港的姦淫劫掠，挪威和希臘的飢饉。就是在大西洋的那邊：成千的房舍淪為廢墟；俄國的鄉村裏納粹的絞架上懸着俄國人的屍體；在德國，武裝的守兵監視着集中營的鐵絲網，猶太人好似牛羊一樣被屠殺。就是在大西洋的那邊：我的愛國同志在獄門的後邊等待着，法國的兒童在挨着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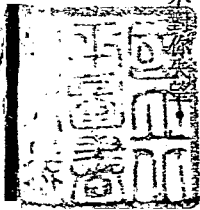
美洲能夠聽見大西洋那邊這種憤怒和反抗的巨大的合唱麼？那邊一切憔悴的人民因為位於反抗軸心的第一道防線而成了軸心的第一批受難者，他們知道極權主義是如何取得勝利的：不是用一個暴君——希特勒，墨索里尼，或東條——的野蠻意志，而是用為戰爭流血只為戰爭流血的成百萬的士兵和成千的殘忍的軍官狂熱合作，一件件完成了無情計劃的侵略行動才獲得勝利的。美國能夠聽見這一切憔悴的人民的聲音麼？

飛剪號顛簸地在納塔爾著陸了。在加勒比海裏又著陸兩次。幾小時以後我們就看到佛羅里達海岸，幾天之後我就知道關於美國的一些新的事情了。現在美國國內正把美國的工業力量向爭取戰爭

勝利這個唯一目標推進。美國能做多麼超等有效的工作呀！回想起來，我記得暴雨似的炸彈之下的考文特里和伯明翰，莫斯科發電機工廠裏衣服藍襪的女工，用木船從上海運到重慶的鍊鋼廠……在狄特律，在聖第亞哥，美國工人起碼能在有熱有電燈的，窗戶沒有破的建築物裏輪班，能用人類創造的最好的工具工作。他們能在夜間回到又有熱有電燈的，沒有人挨餓，他們的兒女安靜地睡著的一座宅子或者一間屋子裏。第二天他們回到工廠的時候，工廠依然立在原來的地方：它不至於被敵人的空襲給毀掉。

真的，現在描述美國享受的特殊的安全利益只要幾個簡單的字就行了。因為在遼遠的海岸那邊美國的士兵在戰鬥，美國的盟邦在戰鬥，所以美國直到現在是安全的。我看見別的國家的種種情形之後，我覺得這似乎是個難以置信的奇蹟。西半球各國和其他聯合國家之間有極大的差異：不論這些國家怎樣試着做，它們對於戰爭永不能有個一致的看法，美國和歐亞受了創傷的人民談判時候必須寬大忍耐，甚而中常的寬大忍耐都可以；同時歐亞受了創傷的人民也必須瞭解美國人往往不能和他們眼光完全一致，因為美國人沒有受過同樣的苦難。

現在我們飛機在日光炙烤的麥阿密城高大的白建築物上空盤旋，這是我第五次返回美國——我第一次到紐約遠在一九二一年。每次返回美國都給我一種特別的心情，現在我又感到這種心情了，美國從未停止對我哼着惠特曼的詩句：「自由呀，讓別人對你失望罷——我永遠不對你失望。」



戰地行

著者 居里小姐
譯者 朱葆光
發行人 孫伏園
出版者 中外出版社
上海 愛多亞路一七二號
重慶 美專校街九十七號
北平 西長安街甲二十三號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重慶初版

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北平再版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北平三版

(P)300-6000



5.578
20

§ _____